



抢救文革回忆 积累文革资料 交流相关信息 促进文革研究

2012 年 1 月 31 日创刊 2012 年 3 月 31 日第 3 期

本期目录

〔武斗专辑〕

访谈

黄振海口述 林雪采访、整理 “街娃”的武斗

史林一叶

卜伟华 文革中死于外地武斗的北京红卫兵（修订稿）

蓦然回首

廖振旅 县武装部发枪武装造反派

唐士六 我们那个老知青武斗队

旧闻杂记

谢声显 我知道的几个武斗杀俘案

文摘

成都军区发枪武装造反派

戴维堤 由中央发枪的北航红旗武装部队

沈如槐 清华大学 414 的“特种部队”

陈益南 在“青年近卫军”的武斗经历

杨里克 杀个人比杀只鸡还容易

故纸堆

张国华谈中央批准给造反派发枪

编读往来

黄肇炎来信谈“三种人”提法出现的时间

〔武斗专辑〕

说明：“全面内战”，是毛泽东也不得不承认的文革两大“错误”之一。文革中为什么全国各地都会爆发内战式的大规模武斗？为什么武斗会长时间得不到有效的制止？为什么毛泽东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对武斗会一度采取十分暧昧甚至欣赏、纵容的态度？为什么各地的“支左”部队会不同程度地在武斗中支

持一派压制另一派甚至直接发枪、参战？……这些都是非常值得研究却远未得到深入研究的问题。当年武斗的参加者大多是长期接受“革命传统教育”、“阶级斗争教育”、“向解放军学习”的教育而成长起来的热血青年，决心“誓死保卫毛主席”、“为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献身”，其中不少人是共青团员、中共党员和从解放军这所“毛泽东思想大学校”里出来的复员转业退伍军人。因他们大多长于“行动”而拙于宣传，少有文字留下，后来又有些人因武斗罪责而被判刑入狱或遭到批斗惩处，先被视为“现行反革命”（政治犯）后又被视为“武斗杀人犯”（刑事犯），“参加武斗”成为一段不光彩的人生记录，所以武斗参与者很难无所顾忌地回忆那些经历。后人对武斗及其参加者的了解和研究就较为困难。本刊尽量搜集了一些亲历或见闻了武斗的人所写文字及相关资料编为专辑，以供有心者作进一步的研究。

【访谈】

“街娃”的武斗

黄振海口述

林 雪采访、整理

受访人：黄振海，男，著名画家，雕塑家。1950年出生于成都市科甲巷一平民家庭。文革前系成都市锦江中学初66级学生，学校“八二六”派红卫兵《新锦江公社》负责人。文革后就读于四川美术学院。现就职于某著名旅行社任策划。

采访时间：2010年至2011年

采访地点：黄振海先生办公室

林雪（以下简称林）：依你的看法，武斗的起因是什么？

黄振海（以下简称黄）：要说武斗的起因，可能要从文革之前的“战争教育”说起。记得我们很小的时候，对于战争就非常向往——因为战争可以产生我们崇拜的“英雄”。所有男孩子们喜欢的电影无一例外都是战争片，比如《上甘岭》、《平原游击队》、《小兵张嘎》、《鸡毛信》……而其中的李向阳、小嘎子，都是我们崇拜的英雄。那时候不仅仅是电影，最为时尚的读物：《红旗飘飘》、《星火燎原》、《红旗谱》、《红日》、《红岩》，都是写战争年代的。

林：《红岩》是写的监狱斗争。

黄：你忘了其中那个最受欢迎的“双枪老太婆”？那也是战争人物嘛。

林：（笑）倒也是。

黄：战争的“硝烟”一直都伴随着我们成长。包括它衍生的“阶级斗争论”和各种各样的“仇恨”论。比如雷锋那段著名的日记：“对同志像春天般的温暖，对工作像夏天般的火热，对待个人主义像秋风扫落叶一样，对敌人像严冬一

样残酷无情。”其实到后来前面的几个都不重要了，就只剩下最后一句——因为到处都是敌人了。

林：记得那时候的漫画和宣传画，不是解放军在打阶级敌人，就是工人和农民在打阶级敌人，一个个胳膊腿都这么粗，眉毛都高高扬起，满腔的仇恨。

黄：在这样的氛围中成长，我们中的很多人都恨自己晚生了几十年，要不然就赶上打蒋匪了，或者是打日本人。没准自己就是又一个小兵张嘎或者是李向阳呢。

林：你的意思，武斗就是这些“战争情结”在作怪？

黄：战争情结是内因，还得靠外因去启动。

林：有人说，武斗是从1966年底到67年初的“夺权”开始的。因为对权力的争夺，才可能产生这么大的仇恨。

黄：依得我个人的感受，是来自“二月镇反”。这有可能是因为我没有参与“夺权”。我一个街娃，也从来都没有想到要去夺别人的什么权。

林：那你是怎么被卷进了“二月镇反”的？

黄：我本人没有被“镇反”的理由。因为开完斗争工作组的大会之后，我就去了外地大串联。我回到成都的那天，1967年的2月18日，正是“二月镇反”的开始。记得从火车上下来，正遇上成都军区的飞机在天上撒传单，传单上就是头一天叶剑英亲自签发的《中央军委给成都工人造反兵团、川大八·二六战斗团同志们的一封信》，又称“二·一七信件”。高音喇叭里不断播送着信上的内容，说部队协助公安局抓“罪犯”（指成都工人造反兵团街道分团的宋立本等人）是正确的，并说：“如果你们继续围攻成都军区，一切严重后果，由你们完全负责。”

林：这些和你有关系吗？

黄：我父母都参加了兵团，而且我母亲就是街道分团的成员，被抓的那个“罪犯”宋立本，就是他们的头头。我父亲也刚刚从阿坝里面出来造反，参加的也是兵团，还是个小头目。

林：你自己呢？

黄：我没有参加学校的八二六，而是在川大去加入的，拿了个红袖套，爱去不去的，吊儿郎当。可是因为在运动初期带头造工作组的反，在所有人眼中，我就是“信”里说的那种造反派。我自己也是这样认为的。

林：在“二月镇反”两个月的时间里，在你的身上发生了什么？

黄：我回到成都之后，就发生了兵团、八二六到人民南路去“向毛主席请罪”的事件。队伍从东大街经过，倒挂着旗帜，到了人民南路广场，就跪倒一大片，哭得呜呜的。我心里很不是滋味，黑着脸往回走，刚刚走到走马街口子上，一辆华沙牌小轿车在我面前“吱”地停下了，一个人从车里钻出来，站在我面前抖抖肩上的军大衣，眼睛斜睨着盯了我一眼，哼了一声，又钻进车里走了。我一看：原来就是运动初期斗了我们几个、后来又被我们斗了的那个工作组的张队长。

林：他是觉得该你倒霉了，他还是胜利者，笑到了最后。

黄：他这一抖，可把我气坏了。后来我们学校的“八二六”来找我，要我回去当“一号勤务员”，就是头头。我毅然答应了。

林：看来就是这个“张队长”启发了你的报复心，让你在最低潮的时候，怀着满腔的义愤参加了“革命”。

黄：是的。记得那天晚上我到春熙南段的“饮涛茶社”，茶社早就没开了，一个《巴黎公社》的中学造反组织在这里设了总部，现在人员已经四处逃散，只剩下些队旗袖套笔墨纸张和几床脏兮兮的被子。我用那旗子把所有的东西一卷，用自行车拉到了学校，然后把我们学校的“红成”（“红卫兵成都部队”的简称）统统撵出去，把他们的团部占领了，开始“战斗”。

林：黑暗中的战斗。

黄：我们很自然把当时的情况比喻成“白色恐怖”，而我们就是那些小“地下党”，每到晚上就出去刷标语。那个时候满街都是打倒我们的标语，充满了侮辱性的语言，把“造反兵团”写成“撬杆（小偷）兵团”，八二六写成“扒耳驴”。我们就专门在那些标语旁边贴标语，比如：青松不老，八二六不倒！头可断，血可流，誓死不低革命头！血债要用血来还！镇压革命群众决无好下场！革命方知北京近，造反更觉毛主席亲！……当然还有些很抒情的，我们把藏族歌曲“远飞的大雁”改了歌词，把“翻身的农奴想念恩人毛主席”，改成了“八二六战士想念恩人毛主席”。唱起来热泪滚滚。

林：同样的歌曲还有“东方红”里的《抬头望见北斗星》，也很深情。

黄：还有“东方红”的那些朗诵词，简直就是我们的心声。比如一开始的那段朗诵词：路漫漫，夜漫漫，长夜难明赤县天。还有一段革命先烈戴着手铐脚镣一步一步走向刑场，唱的“带镣长街行，告别众乡亲，砍头不要紧，自有后来人”，还有后面紧接着的朗诵词：但是，人民是杀不绝的，革命是扑不灭的，共产党人是吓不倒的！他们从地下爬起来，揩干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体，他们又继续战斗了……

林：那个时候，不后悔自己晚生几十年了，赶上和革命先烈一样的年代了。心里充满了悲壮，和为革命献身的崇高感。

黄：这是因为：我们心中有“正义”啊——因为我们是响应毛主席的号召起来造反的啊。虽然都去人民南路跪成一大片向毛主席请罪了，可是回来怎么想怎么没有错。想来想去就只有一个理由：毛主席被那些“老师”反扑了。革命到了关键时刻，我们和毛主席共患难。这个感觉是多么的崇高！同时还有仇恨。大面积的仇恨。就是这种仇恨，成为后来武斗的动力。

林：何以见得？

黄：你想想，那个时候，成都工人造反兵团，号称 30 万人马，还不算各个区县的支队；八二六虽然是个大学的组织，可是很多中学生甚至小学生都参加了，人数也不少。记得“二月镇反”一开始，全省一天晚上就抓了十二万“反革命”，几乎都是兵团、八二六支队长及以上的骨干，很多地方的监狱都关不

下了，全都关在学校和庙子里。成都宁夏街的市大监里关了 1600 多人，大慈寺好像关了 800 多人（注：据记载：到 3 月 4 日，公安机关在成都地区拘捕“造反派”头头和骨干分子 5000 余人。见中共四川省委党史研究室编《中国共产党四川历史大事记（1950—1978）》310 页，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这么多人，加上那些还没有被抓的，这些人在一夜之间被打成“反革命”了，其亲戚朋友加起来应该有多少？还有很多虽然没有参加，但是“同观点”的人呢？这么多的人的仇恨，往哪儿发啊？未必我们还敢去打那些老师？还敢去打成都军区？不敢了嘛。再说人家军区的司令员韦杰，在北京的时候就向我们造反派道歉了，当面鞠躬，人家可是老红军啊，还要怎么样？

林：可是这口气又不能不出，只能去打产业军了。

黄：当然嘛。他们是西南局第一书记李井泉亲自组织起来、专门对付咱们造反派的，百分百的老保，又是亲手把我们的人抓进监狱的“打手”。别看这些人都是党团员，平常听话守规矩，抓我们的时候，可是把我们当成了真正的阶级敌人，就如雷锋同志说的：像严冬一样残酷无情。

林：人家还说你们运动初期的时候也斗过他们呢。

黄：可是我们没有把他们抓进监狱啊！坐监狱这可是天大的事情啊，他们为什么老是想让我们去坐监狱呢？看那个张队长在走马街上的张狂劲，要是那天给他个机会，他完全有可能真正把我抓进监狱里去的。

林：双方的仇恨都在心里疯长。

黄：最疯的时候是“二月镇反”被否定之后，我们成群结队到处去打“老产”。那些大型的国营厂、特别是国防厂的工人，因为经过严格的“政审”，个个根红苗正，大都参加了产业军，成了老产的窝子，也成了我们攻击的主要目标。比如川棉一厂，420 厂、69 信箱、512 军用被服厂……最重要的是 132 厂。

林：最要命的是：打老产成了一场地道的“人民战争”——因为“二月镇反”牵涉的人太多了。

黄：是啊。我们去打，老百姓就去看，去起哄，有机会的话也上去凑个热闹，打两拳头，或者是扔几块砖头，叫做“有仇报仇，无仇打魃头”。打着了对方，是个“战斗英雄”，被打了也是“光荣负伤”，也算“战斗英雄”。

林：问题在于老产也不是“吃素”的，他们也觉得自己很冤枉，也觉得自己是誓死保卫毛主席的，胸中也充满了正义感。

黄：文革的荒唐就在这里。无论是造反派也好，保守派也好，走资派也好，或者是以后造反派内部分裂成的两派也好，都认为是誓死保卫毛主席的，是正义的，而毛主席又不来说个明白。于是就给大家一个“挣表现”的机会，谁能够把对方压下去，谁就是最忠心的。

林：打 132 厂就是这样的一场战争。

黄：我们的人去打 132 厂，是要“攻克老产在成都最后一个顽固堡垒”，而 132 厂的老产，则是按照当时国家的“保密条例”，誓死保卫国家财产，保卫国

家的机密。我们是赤手空拳的，而他们的厂保卫科是发了枪支的，据说 200 多枪支全部都发了。我们是普通老百姓，乌合之众，而他们却是训练有素的转业军人。所以这场武斗，一开始就决定了结局。

林：而鼓舞着赤手空拳的老百姓蜂拥而上的，又是那个该死的“正义感”。

黄：是啊。问题在于就在这个时候，中央还没有正式下达关于四川问题的文件。既没有正式说我们兵团、八二六是“革命派”，又没有正式说他们“老产”是保守派。这个结论一直到第二天，也就是“老产”开枪打死了四十二个人之后，才正式下来。

林：这个文件就是《中央关于处理四川问题的决定》，其中提到：成都军区个别负责人从二月下旬以来，支持了为一些保守分子所蒙蔽、被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背后操纵的保守组织，把革命群众组织“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和“川大‘八·二六’战斗团”等，打成了反革命组织，大量逮捕革命群众。他们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变成了“镇压反革命运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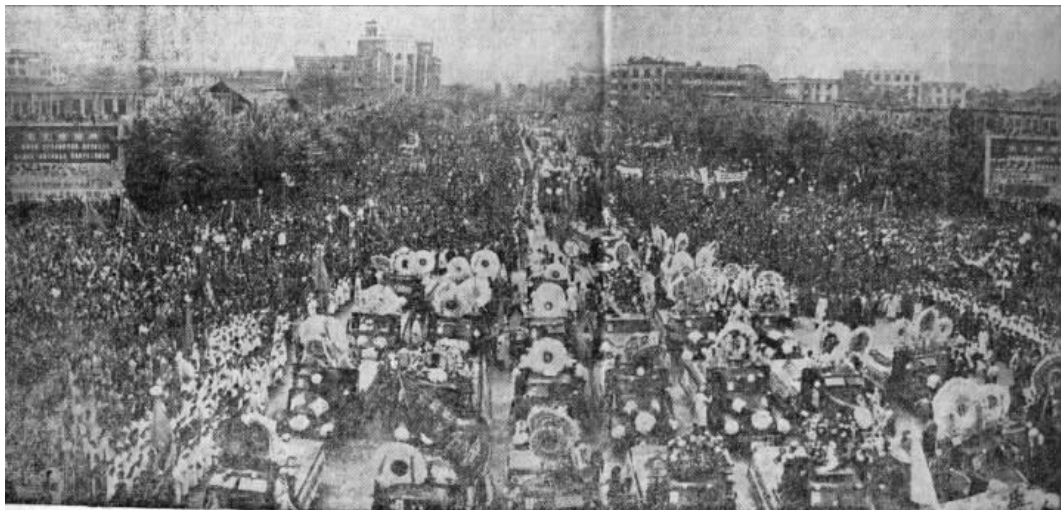
黄：这个文件要是早发一天，或许“老产”的正义感就没了，他们就会自己解散了，我们的攻打就没有了意义。

林：可是历史没有假设。事情还是发生了。记得开枪的消息传来之后，兵团公（共）汽（车）分团把汽车停在人民南路，所有要去 132 厂的人上车就走，现场大约有三万人。

黄：我没有到现场，我在川医急诊室，一群人把北京地质学院的大学生李全华抬进来的时候，我从人缝里亲眼看到他的半边头盖骨没有了，雪白的脑花夹着鲜红的血，发出很浓的血腥味。后来我进过那间停尸房，里面停了四十二具尸体，大多都是年轻人，其中有很多孩子。

林：其中有我妹妹的一个同班同学，十三岁还是十四岁，叫屈德安，盐市口中学初中一年级的学生。我妹妹和她的同学去认尸的时候，根本就无法辨认。天热嘛，尸体都肿得不成样子，后来是根据这孩子的一个特征认出来的：他的一只耳朵上长了个小肉瘤，大家给他起过一个外号，叫“子耳朵”。

黄：我记得事后成都抬尸游行，宣传车领头，很多汽车在后面跟着，成都市民万



上图：“五六”事件后成都街头造反派车队运载尸体和花圈的游行场面。

人空巷。整个城市都弥漫着愤怒和仇恨。我在署袜街看见一群女孩在大街上摆了个桌子，上面是个中学生的照片，扎两条小辫，手里拿个毛主席语录，英姿飒爽的，笑得阳光灿烂。这女孩的名字叫赵宗纯，十七中初三的学生，年龄和我差不多，也是16岁，现在成了躺在汽车上的48具尸体之一。赵宗纯的那些同学，眼睛都哭红了，哭着在为她的家里募捐，说她家里本来就穷，现在她爸妈都倒在床上，今后的日子不知道怎么过。

林：不管是什么目的，拿枪射杀赤手空拳的平民，就是罪恶。

黄：可是开枪的觉得你不是平民，而是暴徒——平民为什么要来冲击国防工厂？当时国家有命令，冲击国防工厂，就是可以开枪！再说了，这三万人要是真的冲进了厂区，确实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那可是造飞机的国防厂，我想，到现在也是不能随便进出的。大概就是这个原因，尽管中央说要追查责任，可是最后这事还是不了了之。

林：那些孩子，十几岁的学生，都白死了。

黄：文革中死的人，都是白死的，太多了。

林：可是复仇的种子埋下了。情绪这东西，是最不讲道理、没有理智的。

黄：记得事件的第三天还是第四天，我们这派在人民南路广场召开庆祝中央《关于处理四川问题的决定》下发，实际上就是一个声讨产业军罪行的大会，号称40万人参加。有人拦住一辆过路的卡车，很多人跳上去，我也跳上去，就去了132厂。我们到了132厂的宿舍区，一群人气势汹汹的，见人就问谁是“老产”。迎面碰上一中年妇女从家里出来，见到我们吓坏了，慌慌张张朝着隔壁呶呶嘴。我们一涌而进，见一瘦老头，很老实的样子，穿了件针织背心，旁边的桌子上有个大搪瓷盅，上面写着“先进生产者”之类的红字。大家一看：肯定是个“老产”。

林：因为“老产”大都是党团员和先进生产者、劳动模范之类的。

黄：我们中间那些彪形大汉，扑上去就打，打着打着听见一声“有人来了”，这才想起这里是老产的窝子，人家可是有枪的。于是拖着那个“老产”就往我们的汽车上跑。132厂的黄田坝离市区还有几十里路，他们一路上都在打。到了人民南路，有人大喊：我们抓到了一个“老产”，是从132厂抓来的！我看见一个穿红色背心的小伙子跳上来，一揭屁股后面的工具皮夹，亮铮铮的一排全是大大小小的改锥！他抽出一支大的就戳，那狠劲！

林：你在做什么？

黄：我算哪根葱啊，一个十五六岁的初中学生，个子又小，胆子也小，吓坏了。等他们打完了，我一看：那老头浑身上下没一块好肉，眼珠子都暴出来，死了。直接就拉到川医停尸房去了。这么多年了，我一直在想，一个活生生的人，就这么死了？他家里的人会怎么想？还有他到底是不是“老产”啊？就凭那个慌慌张张的女人一撇嘴？就凭桌子上那个“先进生产者”的大瓷盅？

林：正常情况下，很难想象一群身强力壮的人，会对一个老人这样下毒手。成都的武斗就此拉开了序幕。

黄：虽然相隔很近，但是成都的武斗和重庆不同。重庆武斗的主力（尤其是到后来），大多是兵工厂的工人，他们都是转业军人，专业的“杀手”，在部队的时候都是“带着阶级仇恨”在练兵，他们一拿上枪，就下狠手。而且，重庆的兵工厂也让那个城市充满了杀气，人的性格都比成都人“猛杀”。包括重庆大学的学生，也都敢下手。可是成都的武斗，多少有点“游戏”的感觉。

林：记得江青在武斗中说过一句话：小青年，爱玩枪。

黄：这算她说对了：我们对枪，起初就是个“玩”字。

林：我也玩过。我向一个军队的造反派借到过一支五四手枪，限期一周。那是一支没有撞针也没有子弹的枪，相当于玩具。我才知道原来枪是如此的简单，就那么几个零件，太简单了。几乎和“凶器”联系不起来。一点畏惧感都没有。

黄：我们玩的可是真家伙。不但有撞针，而且有子弹，还有炸药。我们玩出来许多惊悚。现在的那些专门玩惊悚的电影电视剧，也不见得能够设想出这样的情节——因为他们没有“生活”嘛。

先说手榴弹吧。有一次，我坐在春熙路财贸干校大门外面的巷子口，研究一颗手榴弹。我拉开手榴弹的后盖，里面是一层防潮纸，捅破防潮纸，是一根白色的粗棉线，慢慢拉开那根棉线，就看见线头上系着一根很细的铁丝。这铁丝后面又是什么呢？我不经意地拉着，突然吱的一声，从它的尾巴处冒出了白烟。我浑身上下一麻，引线燃了！我下意识往四周一看：不过几米，就是人流熙攘的春熙南路，身后就是财贸干校，周围都是民房——这颗手榴弹现在随便往哪儿扔，都要伤人。就在这个时候，我突然发现小巷的拐角处，有口水井。手榴弹从冒烟离爆炸的时间，只有三秒，我几个跨步冲到那口水井旁，别开脸闭上眼把手榴弹往井里边一塞，就听见“轰”的一声巨响，地动天摇，繁华的春熙路上，人群崩山一样四散逃跑，刹那间就一个人影都没了。

林：不知道还有没有人记得这个令人魂飞魄散的故事。

黄：如果在成都市民中间去征集，当时在春熙路上的人中间肯定有人记得。只是他们不知道其中的底细。

林：你当时是什么感觉？

黄：也吓了一大跳。不过事后觉得庆幸，还有些自豪：我毕竟经历了一场惊险啊。

林：什么时候“游戏感”开始消失的？

黄：从那次“被偷袭”开始。

林：说来听听。

黄：我们学校其实也是两派，只不过“红成”被我们赶跑了，一直都寄居在河对面的“川医”。他们心里不服气，就跑来“偷袭”。来的时候正是半夜，我一个人住在三楼。我在熟睡中突然惊醒，莫名其妙地觉得事情不对，翻身跳起来，抄起捷克式机枪就上了房顶。偷袭啊，是在你根本就不知道、根本就没有任何准备、基本上不具备抵抗力的情况下到来的。这个时候，你基本上就

是一个没有外壳的软体动物，怯弱就是你的本性。这样的本性令我汗毛突然倒立起来，浑身不听使唤地得发抖。我用发抖的手抓起捷克式，对着那感觉到有问题的暗处就是一阵扫射，子弹带着火光直射而去，果然照亮了一群慌乱的人影，然后是嘈杂声起，大路上响起了汽车的马达声。几分钟之后，马达的声音逐渐远去，黑夜归为寂静。我紧扼着枪机的手久久没有松开，背上被冷汗浸得一片冰凉。

林：从这次开始，你有了什么变化？

黄：畏惧死亡。知道了枪是会真的打死人的，是有后果的，而且是很严重的后果。我有一个街坊，同院子住的，就是被枪打死的。那是人民南路“十中保卫战”，他去看热闹，他躲在一堵墙后面，刚一伸头，就被打死了。抬着他的担架从我面前经过，那黑红的血丝黏黏的，被风吹得飘起来，牵成了长线，他手搭在担架下面，还是软沓沓的。他父亲在一边靠着根柱子，脸色蜡黄，瘫成一团，不久也死了。

林：记得那时候经常抬尸游行，很吓人的。

黄：十里店一个什么厂的工人，兵团的，叫张邦银，被抓住后往肚子里塞了一支雷管，炸死的，尸首抬出来游行，肠肠肚肚翻出来，红的红绿的绿，当场就有人在大街上吐了一大摊。兵团街道分团的头头宋立本，文革前就坐过牢，“十中保卫战”的时候曾经抱着炸药包要去炸楼，很亡命的。可是后来，他被一中的“红成”抓住，在肚子上挖了个洞，“点天灯”，死得很惨。

林：面对这样残酷的死亡，你的“英雄梦”呢？

黄：嗨，还有什么英雄梦啊。人在死亡面前、在血腥面前都有一种天然的恐惧，这个时候我才知道我就是个凡人，我不可能“面对死亡放声大笑”。我见到的所有的人都是凡人，包括那个偷袭了兵团在生物制药厂的驻地、后来被枪毙的革命烈士的后代路殿云。他在牢房里哭啊，哭得呜呜的，他终于明白了：他不是什么战斗英雄，不是为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而战，他就是一杀人犯。说句不好听的：我甚至怀疑革命先烈，是不是都像《红岩》上写的那样英勇。如果是真的，或者可以这样解释：他们有理想，胸怀正义，所以他们宁死不屈；而我们那时候已经没有理想了，弄不明白谁是革命派谁是反革命了，所以我们成不了英雄了。

林：所以说，人得把自己放在“正义”的位置上，才会有胆气。一旦觉得“没意思”了，就泄气了。记得当时成都的大学生，都对武斗没什么兴趣。有个大学生还对我说过：什么派不派的，都是他们头头们的事情，和我们下面的“战士”没什么关系。

黄：他们的年龄毕竟比我们大一些，想的也会多一些，而且一些人都有了女朋友。冷静下来之后，会觉得家里出自己这样一个大学生不容易，就这样不明不白被打死了，真的不划算。当然了，除非已经成了杀人狂。那些“武斗之花”就是杀人狂。他们就是文革武斗培养出来的“勇士”，他们对杀人有着特殊的“兴趣”。而我们则是“意志消沉者”。记得好像是“九五交枪令”之后吧，

我们把所有的枪支统统上交，然后到处去玩了一圈，回来就下乡当知青去了。
林：之前接受的那些“战争教育”，一旦接触到真正的战争，也都土崩瓦解了。
黄：不但是我们了，我相信所有真正参加过战争的人，没有谁会“热爱”它。这东西，是个恶魔。而这个恶魔，往往又穿着各种漂亮的外衣。而我们老百姓，实在搞不清楚其中的真假。

【史林一叶】

文革中死于外地武斗的北京红卫兵

（修订稿）

卜伟华

按：本文原稿载作者博客，后由华夏文摘增刊 832 期·文革博物馆通讯 664 期转载。现本刊发表的是修订稿，内容有新的补充。在此次修订期间，清华大学唐少杰先生曾两次帮忙查找、提供相关资料，谨致谢忱。

文化大革命中，北京红卫兵在外地武斗中死亡的现象屡屡发生，但未见有比较全面详细的资料可供检索，现将我所了解的一些案例做一介绍，涉及的地方有青海的西宁市，四川的成都市、宜宾市、重庆市，河南的开封市，江西的抚州市，湖南的常德市、湘乡县，湖北的武汉市，辽宁的鞍山市，江苏的南通市，浙江的温州市和安徽省。北京红卫兵在外地武斗中死亡的实际人数当然远不止这些，希望有了解情况的朋友将自己了解的情况介绍给大家，以助于文革史研究的深入。

张大海

1967 年 2 月 23 日，青海省西宁市发生“二二三”事件。西宁地区驻军联合指挥部对占据青海日报社的造反派进行了武装镇压，酿成重大流血事件。这次事件造成 169 人死亡，178 人受伤（陈云峰主编《当代青海简史》，第 194—197 页）。在死亡者中有一名北京中国人民大学附中的学生张大海。

关于张大海，现只知道他是人大附中高六六级一班的学生，是人大附中红卫兵（老兵）的成员。清华附中红卫兵编印的《清华附中红卫兵诗词》中现存两首悼念张大海的诗词，其中一首“卜算子”词曰：“壮士辞北京，热血喷西宁。捍卫真理宁玉碎，一死泰山轻。英魂永不散，丹心照汗青。继承先烈革命志，不愧红卫兵。”（清华附中红卫兵《清华附中红卫兵诗词》，1968 年 5 月，油印本第 15 页）

从原清华附中红卫兵宋柏林的日记中可以看到这样的记载：在“老兵”失势后，宋柏林等人于 1967 年 1 月 31 日坐火车到了西宁，2 月 2 日到“八一八红卫兵总部”和“红色工人造反总部”等组织去作调查了解，在那里，他们“老兵”和“首都三司”、北航“红旗”等造反派站在一起，支持“八一八”，反对“捍

卫队”，2月3日在省建公司楼上，“在会议室里见到了‘首都三司’，还有‘首都红卫兵赴西宁造反支队’的。我们认识了一个北京七中的学生李增乾，他邀我们到他那去，他们住在军区招待所，19个中学生全是红五类出身。他们早在10月前就来了，干得很热火……”（宋柏林著、余汝信编注《红卫兵兴衰录——清华附中老红卫兵手记》，香港：德赛出版有限公司，2006年第一版212页）

不知张大海是不是这19个中学生中的一个？

严格说来，他不应算作死于武斗，因占据青海日报社的群众并未进行武装对抗。

李全华

1967年5月6日，成都国营峨眉机械厂（即132厂），两派群众组织发生大规模武斗。当天上午，该厂造反派调集厂外造反派围攻厂内保守派，双方用砖头、棍棒武斗。当造反派冲击该厂保密生产区时，退守生产厂房的职工动用民兵武装的各种枪支，向围攻者开枪射击，打死48人，打伤127人（中共四川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四川历史大事记（1950—1978）》，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314页）。在死亡者中有一名北京地质学院的学生李全华。

文革研究者杜钧福在题为《我所参加的文化大革命》的长篇回忆中介绍了他当年在成都“五六”惨案后到成都了解到的情况：“当时（中国科学院）数学所两个人和北京地质学院的学生李全华同在一辆汽车上，突然枪响了，打中了站在他们中间的北京地院的李全华和一个成都的红卫兵范培瑾，溅了他们一身血。血衣尚在。那辆车我们后来也坐过，看到上面有四个弹孔。我们就住在华西坝一个刚建成的新楼里，睡在地铺上。”（杜钧福的博客

<http://blog.sina.com.cn/junfudu>）



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主办的《东方红报》1967年5月3日出版的第35期，报道了5月10日下午“首都革命派”召开追悼5月6日在四川成都两派群众组织冲突中不幸中弹身亡的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红卫兵李全华的大会情况。李全华的母亲、哥哥、叔叔以及“来自八个国家的几十位国际友人”（即在京外国专家造反派）出席了大会。

（上图：李全华追悼会上控诉者展示血衣。）

张玄杰、王俊英

1967年5月13日，北京工业大学“东方红”张玄杰（机械系61级，中共预备党员）、王俊英（无线电系64级，共青团员）死于四川宜宾武斗。

据《中国共产党四川历史大事记》记载：1967年5月13日至19日，宜宾两派群众组织因对刘结挺、张西挺等问题有不同看法而尖锐对立，发展到有数

千人参与，使用钢钎、木棒、石头等为武器，在宜宾城区进行武斗，造成数人死亡，数百人受伤，2300多间房屋被破坏（《中国共产党四川历史大事记（1950—1978）》，第315—316页）。

据宜宾造反派头头谢英富回忆：5月13日，宜宾造反派组织游行，遭到保守派阻击而不得不撤退避让。外地赴宜的红卫兵看到大规模的武斗发生，造反派赤手空拳，处于挨打的境地，于是他们就到军分区去请求解放军出面制止武斗。不料军分区门卫不但没答应学生的请求，反而有个别人将他们推出军分区大门（这时军分区外已被保守派的人手持棍棒、钢钎占据了）。保守派的人好像杀红了眼似的，不管见到谁都打，毫不手下留情，可怜被推出军分区的首都红卫兵张玄杰（北京工业大学学生）、王俊英（同为北京工业大学学生）两位同学，竟被保守派围在军分区大门口的人用乱棒和钢钎活生生地杀害了。这就是震惊全国的“五一三”事件，宜宾大规模武斗事件的真实起因（见宜宾造反派领袖谢英富回忆录《脚印》，天涯社区·煮酒论史）。

据王俊英的同班同学介绍，1967年3、4月间，刘结挺、张西挺在北京时曾应邀去过北京工业大学，后刘、张在得到中央支持，受命回宜宾筹建革委会时，从北京带上一大批红卫兵做他们的支持者，北京工业大学去了很多人，张玄杰、王俊英即在其中。这位同学回忆说：“临走时，在我们宿舍，中午大家各自躺在自己的床上，但是没有人睡觉，都在说上四川的事。有的同学说现在四川武斗挺厉害的，你们可千万小心，有的说你们要‘生做毛主席的红小兵’。王俊英接着说：‘死做毛主席的红小鬼’。说完大家哄堂大笑。说者无心，都当是玩笑话。谁也没往心里去。身在北京，根本想不到真的武斗会打死人，更想不到就会轮到自己头上，但是事实就是这样残酷，灾难被言中，真的降临到我们的头上。五月份四川武斗不断升级，王俊英、唐林、王俭在四川宜宾——刘结挺、张西挺的根据地，真的赶上了大规模的武斗。当武斗的群众手举着带钉子的狼牙棒冲过来时，王俊英、唐林这些北京去的红卫兵只是手里拿着《毛主席语录》夹在两派之间，高喊要文斗不要武斗。而此时大棒已经朝他们头上挥去，据说，上午九点多王俊英被打倒后直到下午五点去世，中间就没醒过。她的脑袋打裂了，脑浆都流出来了。就这样她把自己最宝贵的生命永远地留在了四川，和她同时被打死的还有六系的男生张玄杰。而唐林当棒子向她挥来的时候她迅速地用双手抱住了头，她的手被打伤，但生命却保住了。”（见《瑰丽夕阳的博客》：<http://lhxing1946.blog.163.com/blog/static/1288467252010102824723324>）

5月19日，北京工业大学“东方红”召开“向王俊英、张玄杰烈士学习继承烈士遗志将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誓师大会”，王俊英的母亲、张玄杰的大姐讲了话，王母讲话中说，王俊英是她的独生女，生前曾表示为保卫毛主席牺牲了也心甘，“这回她的愿望总算达到了”。北京市革委负责人吴德、常委周景方到校表示慰问。而“东方红”的对立派学生对吴德此举颇不以为然，群起而围攻之，“吴德被挤得满头大汗，在人群中无法前行”（见《瑰丽夕阳的博客》）。

由岩佐昌璋、刘福春编选的《红卫兵诗选》，2001年3月由日本福岡市的中国书店出版。其中东方红公社“英特纳雄耐尔”的题为《在战火中得到永生》一诗所描述的正是北京工业大学“东方红”战士张玄杰、王俊英“为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英勇牺牲”的情景：“……迎着刺刀木棒，/高举红书，昂首阔步。/面对围攻毒打，/坚贞不屈，岿然不动。/他们不愧为东方红的好战士，/他们不愧为毛主席的红小兵。”（杨剑龙《狂热年代红卫兵情感的宣泄与记录——读〈红卫兵诗选〉》，《二十一世纪》网络版2003年1月号，总第10期）

刘天章

1967年8月20日，北京航空学院红旗战斗队的学生刘天章在河南串联时，因介入开封化肥厂的两派武斗，被保守派开枪打死了。

刘天章是北航红旗的骨干分子，北航革委会成立了数十人的治丧委员会，召开了隆重的追悼大会，追认刘天章为革命烈士。追悼会后，刘天章的骨灰放到俱乐部门口灵堂，北航红旗战士们为刘天章守灵。一些炮打过中央文革的高干子女被押来跪灵请罪，红旗中的一些学生发誓要为刘天章报仇，许多对北航“红旗”不满的人吓得敢怒不敢言。那几天北航充满了“红色恐怖”。8月24日，恰逢李明清（西南局第一书记李井泉的儿子）《炮轰……》大字报发表一周年（北京航空学院红卫兵李明清、赖锐锐、王晓东、李洪瑞、刘福曾于1966年8月24日贴出题为《炮轰……》的大字报，其中说：“毛主席是我们的伟大领袖，既然运动是他老人家亲自发动的，而且北大的第一张革命的大字报又是经过了长期的筹备，首先又经过他老人家亲自审阅过，对于派工作组的问题难道他老人家会不知道吗？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么我们不禁要问，当时在北京的党中央常委究竟听谁的？又是怎么研究决定的，刘主席、周总理、邓小平总书记等同志都做出了检查，可是把责任承担下来了后，工作组又该担负什么责任呢？没有明确的指示，所以造成了同学们对工作组的问题意见分歧很大。我们认为这是某些同志应该负责任的。”这大字报被认为是把矛头指向了毛泽东的反革命大字报）。这天晚饭后，一些北航“红旗”的学生陆续把几个“炮打中央文革”和写过《炮轰……》大字报的学生拉到东操场批斗，其中有李明清，有地质部长孙大光之女孙茜玲，建材部长赖发之子赖锐锐，铁道部军管会主任苏静之子苏晓前和工农子弟吴仙虎等人。李明清和吴仙虎被殴打致死。后来，工、军宣队进北航后抓凶手，查了半天，也定不了谁是主要凶手。最后，把发起批斗和参与打人较厉害的几个学生抓起来判了几年刑（戴维堤《逝者如斯》）。

后北京航空学院革命委员会和“红旗战斗队”政治部编印了《红卫兵的好榜样——刘天章》一书。此书现在还可在“中国收藏在线”等网站上买到。

包康玲

1967年8月18日，年仅21岁的北京市五十三中学语文教师包康玲在重庆两派武斗中被打死。当天“凌晨，大坪、潘家坪一带的市民被晴空霹雳般的枪炮声惊醒。巨大的爆炸声是重大“八一五武斗队”炮班的榴弹炮从虎头岩向几处准备进攻的地点进行的首轮炮击。“八一五派”向“反到底派”占据的石油路重庆河运学校、邮电器材厂和潘家坪高干招待所、大坪重庆医学院等地发起总攻，两派展开大规模武斗，使用了榴弹炮、三七炮、高射机枪、坦克等武器，恶战至20日，死上百人，河运学校、医学院、潘家坪高干招待所房屋被打坏，邮电器材厂一幢宿舍被“八一五派”武斗指挥下令炸毁……”

（何蜀《为毛主席而战——文革重庆大武斗实录》，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和香港浸会大学当代中国研究所出版，2010年版，第225页）

1967年10月16日出版的重庆“反到底派”小报《东方欲晓》上刊登了包康玲追悼会的情况和包康玲生平简介、书信摘选。

包康玲 1965 年在北京师大女附中高中毕业，分配到北京五十三中作语文教师，是五十三中井冈山兵团、红教兵成员。1966 年 12 月和 1967 年 5 月两度来到重庆，是坚决支持重庆“反到底派”的首都红代会赴渝兵团的成员。在重庆武斗急剧升级的时刻，包康玲誓言“与山城‘反到底派’共存亡”。在此期间，包康玲 3 次负伤。8 月 18 日，在潘家坪战役中，包康玲被子弹击中，子弹从左颈穿入直到肺部，经多方抢救无效，于 8 月 20 日死亡。

在包康玲的追悼会上，她母亲应邀到会作了一定要“化悲痛为力量”、继续“为捍卫毛泽东思想而战斗到底”的讲话。



贺英、潘仲成

1967 年 8 月，北京一〇一中两个学生贺英和潘仲成到江西串连，支持当地的造反派，在武斗中被打死，两人均为 19 岁。2009 年出版的《证照中国——1966—1976》一书中收录了北京一〇一中学“毛泽东主义公社”发出的讣告（许善斌《证照中国：1966—1976》，新华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56 页）：

讣告

我首都红代会 101 中毛泽东主义公社革命委员会以沉痛的心情向革命造反派的战友们发出讣告如下：

在滔滔的赣江边，英雄的南昌城下，毛主席最忠实的红卫兵，我们的好同志，好战友——贺英、潘仲成同志，为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为支持革命造反派，八月二十四日，英勇地献出了自己年轻的生命。

贺英、潘仲成同志，是我毛泽东主义公社的优秀战士，前不久奔赴江西，为

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与当地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生死与共，并肩战斗。

八月二十四日，江西反革命组织“联总”抚州“32111”疯狂进行反革命暴乱。早六时听此消息，贺英、潘仲成同志及首都大中学校红代会战友、江西革命造反派奔赴抚州。八点钟赶到温泉镇，哪想到反革命暴徒设下埋伏，不幸遭伏击，暴徒们向首都和江西的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疯狂地下了毒手。

暴徒们的机枪喷着火焰，火舌向着革命小将射去！面对死亡何所惧，革命小将高呼“毛主席万岁”！与暴徒英勇搏斗！首都和江西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倒在同一血泊里。“毛主席万岁”的口号声与枪声交织在一起。赣水为我哀悼，群山为我抽泣，贺英、潘仲成同志在这次战斗中流尽了最后一滴血。二烈士均年十九岁。贺英同志，是我红代会 101 中毛泽东主义公社革命委员会委员，生前任我公社对外作战部部长。潘仲成同志，是中学红代会组织部工作人员。

.....

我们最亲密的战友，贺英、潘仲成同志英勇地牺牲了，他们的血不会白流，他们的仇我们要报！让我们接过他们手中的用鲜血染红的战旗，奋勇前进！不把党政军内一小撮走资派彻底打倒，决不罢休！不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死不瞑目！

烈士们，安息吧！

打倒刘邓陶！打倒江西“联总”！镇压抚州 32111 的反革命暴徒！

为革命牺牲的贺英烈士永垂不朽！

为革命牺牲的潘仲成烈士永垂不朽！死难烈士万岁！

（烈士灵堂设一〇一中）

首都中学红代会 一〇一中毛泽东主义公社

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九日

1967 年 6 月 28 日，江西农学院的造反派与南昌县莲塘镇对立派群众组织发生武斗。29 日凌晨，江西省造反派组织“大联筹”头头陈全生策划从江西省军区所属部队抢夺枪支弹药，组织 6 批武装人员赴莲塘参加武斗，造成严重流血事件。同日，赣州发生大规模武斗，造成流血事件（中共江西省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中国共产党江西历史大事记》，新华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299 页）。莲塘的保守派得到宜春军分区和南昌县武装部的支持，在武斗中占据优势，造反派死亡十余人。赣州军分区和赣州市武装部给保守派“联络总站”发了枪，在武斗中“大联筹”派死伤惨重，事后查点，发现造反派尸体 223 具（据《周总理第六次接见江西四方代表座谈记录》，1967 年 8 月 5 日。另据“大联筹”1967 年 8 月 12 日出版的《火线战报》说：“目前，据江西省大联合筹委会与广州部队新调赣州某部联合调查，已发现我造反派和红卫兵尸体 490 具（不包括江中打捞的）其中有 223 具已被认出来。”）。毛泽东得知此事后，认为问题严重，遂紧急调兵遣将，前往增援（7 月 4 日，中央军委办公厅编印的《群众来信摘抄》上登载了江西赴京控告团、江西赣州赴京控告分团的电话汇报，反映赣州武斗情况严重，

人员伤亡很大，断粮断水，交通全部堵塞，要求中央立即派部队前往制止武斗。毛泽东将此件批给林彪、周恩来：“赣州问题严重，涉及整个赣南十多个县，调一个师去，只能管南昌、吉安、宜春、抚州等处，对赣南鞭长莫及。是否可从广州军区调一个师，至少一个团进驻赣州，将事情办好后仍返广东。此事请先考虑，待面商。”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二册，第370页）。

8月10日，经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处理江西问题的若干决定》，认为江西省军区及部分军分区的某些领导人在支左工作中犯了严重的方向、路线错误，决定改组江西省军区，派遣济南军区、广州军区的部队进驻江西各地，任命程世清为江西省军区政治委员，杨栋梁为省军区司令员，成立以程世清为主要负责人的江西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

中共中央旗帜鲜明地支持造反派，但中央的一系列举措并未能够马上平息江西的动乱。8月24日，江西抚州地区发生严重武斗事件，程世清等本着坚决支持左派的原则，派出支左部队前往介入。武斗中先后死亡干部群众65人（中共江西省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中国共产党江西历史大事记》，新华出版社1999年版，第301页）。

这65人当中，应该包括北京一〇一中的贺英、潘仲成两人。

李磊落、肖化时、刘庆、羌于正

唐少杰整理的《清华大学文革时期“非正常死亡”人员名单》（见《记忆》总42期）中列出了4名在外地武斗中死亡的清华大学学生，他们是：

李磊落，男，22岁。清华电机系电9班学生。1967年8月7日在湖南常德参加群众武斗时，遭遇机枪扫射致死。

肖化时（亦写作萧化时），男。清华无线电系无706班学生。中共党员。1967年8月11日参加武汉造反派群众组织的横渡长江的活动中，与武汉“百万雄师”进行武斗致死。（肖化时的死亡时间有误。邱心伟、原蜀育主编的《清华文革亲历——史料直录·大事日志》中收录了清华井冈山关于肖化时的讣告，其中肖化时死亡的日期为8月1日。经查证，1967年8月1日，武汉造反派组织了横渡长江活动，由于组织不周，在武昌长江大桥下水时，拥挤践踏，死亡100多人，造成渡江史上最大惨案。肖化时即死于这次惨案，他的死亡原因不是参加武斗。但当时造反派称惨案是走资派和百万雄师制造的，所以肖的讣告中说肖“于1967年8月1日参加武汉市革命造反派组织的横渡长江活动，在党内一小撮走资派和武汉‘百万雄师’中一小撮混蛋制造的‘八一惨案’中英勇牺牲。”见邱心伟、原蜀育主编《清华文革亲历——史料直录·大事日志》，香港五七学社出版公司出版2009年版，第242—243页）

刘庆（刘仁堂），男，23岁。清华无线电系无91班学生。1967年8月中旬在辽宁鞍山市参加当地群众武斗时致死。

羌于正，男，22岁。清华动力与农业机械工程系农9班学生。1967年8月29日在江苏南通市参加当地群众武斗时致死。

在清华“井冈山兵团”“赴鞍纵队”写的一篇题为《拥军的模范，支左的模范》的文章中介绍了刘庆的一些事迹：他和“赴鞍纵队”曾与驻军队谈了七、八次，把我们了解情况统统讲了出来。8月13日，中央对鞍山表态前一星期，刘庆起草对鞍山局势发表声明，坚决支持鞍山“捍卫队”。这声明对鞍山驻军和支左的三一七四部队给予极高的评价，给林杰之流“揪军内一小撮”反动理论当头一棒。“鞍山革命派为了纪念他、学习他，完成他未完成的事业，召开了有八万人参加的追悼会。”（见《清华文革亲历——史料直录·大事日志》，第268页）

9月18日，清华《井冈山》报刊登悼念关于正的文章，文中说：“8月28日，党内一小撮走资派蒙蔽数万农民包围南通城。明晃晃的大刀，乌黑黑枪口，雨点般落下的石块，整夜喷吐硫酸的水龙……。在两天两夜的激战中你冲杀在第一线……战斗的最后一刻，暴徒们冲到三楼楼梯口，你还要爬到窗口去接电话线，万恶的子弹夺去了你的生命。”

清华《井冈山》报第73期报道了李磊落（在湖南常德武斗中）、萧化时（在武汉八一渡江活动中）身亡消息和蒯大富、鲍长康、刘才堂的悼念文章《李磊落同志永垂不朽》。

8月13日，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总部举行肖化时、李磊落追悼大会。9月18日，又举行刘庆、关于正追悼大会。兵团总部政治部决定：建议党组织恢复后追认在武斗中“牺牲”的李磊落（8月7日死于湖南常德）、刘庆（8月31日死于辽宁鞍山）、关于正（8月29日死于江苏南通）三“烈士”为中共正式党员。

清华大学《井冈山》报1968年4月12日第132、133合期第8版，在《死难烈士万岁》栏目下刊登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十七军驻常德部队1967年10月18日为李磊落出具的烈士证明，称：“你兵团李磊落烈士于1967年8月7日两点左右，在抢运工联、湘江风雷等革命造反派组织伤员归来的途中，在东门一侧不幸被红联伏击，中弹英勇牺牲。”同时刊登的还有湖南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1967年10月23日的证明信，信中还建议对李磊落“追认革命烈士，今后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均以烈士待遇”。

周锡坤

1967年8、9月间，北航红旗战士周锡坤在湖南湘乡县城被保守派抓住后枪杀于县城街头，身上中弹数十发（戴维堤《逝者如斯》）。

王建新、周瑞青

据《北京大学纪事（1898—1997）》（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4月第一版）下卷663页记载：原“井冈山公社”成员王建新、“新北大公社”成员周瑞青，在温州参加武斗，被机枪扫中死亡。

北京水电学院一学生

在1967年9月8日发出的中发[67]292号文件《中共中央对第五十九期〈铁路情况快报〉的批示及附件》中，附件《铁路情况快报》里有这样的记载：

北京水电学院一名学生在安徽武斗中被打死，尸体昨天运到郑州车站，要求铁路把尸体装在冷藏货车内挂在（36）次客车上运来北京与另一派对质。铁路部没有同意。动员他们就地火化。（湖北省革命委员会编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文件汇编[二]》，武汉：1968年4月。转载自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盘，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2006年〔第二版〕）

以上只是在有限的阅读中所得到的点滴材料。这类情况应该还有，望知情者提供补充。

【蓦然回首】

县武装部发枪武装造反派

廖振旅

按：文革武斗中，特别是在1967年夏秋之交各地的大规模武斗中，许多地方都出现过部队或军分区、武装部发枪武装群众组织的情况，有的是武装保守派，有的是武装造反派，有的是公开发，有的是半公开发，有的是授意群众组织来“抢”，实际上是明抢暗送……湖南省资兴县当时就发生过一次县武装部发枪武装造反派而遭到保守派伙同农民围困、殴打，闹得满城风雨、遗患多年的事件。本文作者当年曾参加过对此事件的调查，后来还曾为此遭到审查。从这一事件可以看出当时社会上的混乱情况和军、民双方的思想情绪，了解到武斗为何能升级为“全面内战”的一些背景。

1967年8月10日，资兴“工联”（全称为革命造反派工人联合委员会）张贴来自县邮电局的电话纪录：县委常委、县武装部政委吴景斌在郴州签字同意三条，一是支持工联、湘江风雷，二是对“工代会”（全称为革命造反派工人联合代表大会，是工联对立派“县红筹”解散后建立的新组织）不承认、不支持，三是同意发枪支武装造反派。吴在郴签字前，曾亲自用电话征得资兴武装部在家首长同意。

电话记录上街不久，县公安中队两名战士贴出声明说：吴签字的协议只代表他本人，不符合毛泽东思想，他们不承认、不执行；工代会是群众组织，不能干涉。与此同时，工联派“向阳”（全称为资兴县委机关誓死捍卫毛泽东思想向阳战斗队）贴出大字报说，“县红筹”（全称为县红色造反派革命筹备委员会）解散后，头头转移农村，将会要挑动农民进城围攻造反派。11日夜，街头盛传吴景斌被打成重伤，抬着回武装部。尽管张洪臣部长在广播站作广播讲话时说“吴政

委没有挨打”，一些农民还是包围在广播站门前。“在险峰”（全称为资兴县委机关无限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在险峰战斗队）一号头头担心农民势力大，造反派顶不住，便发电报给三都煤校“红大军”（全称为红色造反大军）请求支援资兴工联，电报稿交工联头头阅改后于12日零时15分发给煤校。

8月12日，爆发了资兴争论多年的“八一二”事件。

资兴工联三名头头（县邮电局那位工联主任、县酒厂那位工联副主任、县物资局那位工联委员）在武装部听张洪臣部长亲口交待：“12日发枪，要早一点，免得农民知道了出问题。”三人立即电话通知各组织所有上册的基干民兵在12日上午8时去武装部领枪。

8时过一点，工联派约两百人先后排队进入武装部，站立部办公楼前操坪内等候发枪。三都煤校“红大军”的人手持枪支，乘一辆货车也在此时抵达资兴县城并进入武装部操坪内。张洪臣说管枪支仓库钥匙的人不在家，要去找。这时，大批农民陆续涌来，围聚在武装部大门口或坐在围墙上。至8时半，围观农民已逾千人。造反派头头问张洪臣怎么办。“红大军”有人说把锁砸开。张洪臣说，砸就砸吧（也许是无奈地说）。当“红大军”砸开仓库门锁后，武装部一位参谋手持名册点名开始发枪时，农民们从大门冲进或从围墙上跳下，围着领枪的人。聚在一旁的武装部家属高喊：“不许抢解放军的枪！”农民们把造反派领的几支枪夺回来，同时也把煤校“红大军”带来的几支枪夺走。农民每夺回一支枪，武装部那位支左的副科长就高喊一句：“毛主席万岁！”刚解散的“县红筹”一些人在旁指点农民抓打领枪的人，有39名领枪者被打，其中两名县文艺宣传队的年轻姑娘被撕破了内衣。有的领枪者见机钻出人群溜走了，县农具厂百多名领枪者排队退出武装部，一些造反派头儿和骨干则被围困无法脱身。“红大军”的汽车轮胎被人戳破放了气，也无法回去。武装部把那些被困的人保护进入办公楼室内免继续挨打。此时这些被困在室内的人在“打不还手、骂不还口”之后，还饿着肚皮高唱毛主席语录歌：“下定决心，不怕牺牲……”靠“精神胜利法”支撑着。

在武装部调停下，农民中几位“代表”与造反派的几个被困头头在武装部办公楼室内谈判，农民要这几个头头签字承认“抢枪”。代表头头签字的就是“向阳”一号头头也即原“东风”司令。他不肯承认“抢枪”而又无法冲出重围，便将自己姓名颠倒签在谈判协议纸上以示“是非颠倒”。持续至中午1点多，武装部派车把被围困的十多人送去三都镇乘火车赴郴“避难”。

被围困在武装部的十几人抵郴住在地委招待所，加上为逃避农民抓打陆续从县城来的人，一起讨论“八一二”。开始是内部相互埋怨。“在险峰”二号头头满腹怒气，指责先溜出武装部的“在险峰”一号头头和酒厂的那位工联副主任“贪生怕死”，指责那位签名承认“抢枪”的“向阳”一号头头“叛变”，指责县农具厂集体退出武装部的一百多人是“临阵脱逃”。被指责的头头当然不满，各自解释当时的所想所为。后来大家统一看法，认为是进入了武装部设的陷阱，人家以“发枪”为名、暗中挑动农民伙同“县红筹”派和家属围剿造反派，由此议定不能再对吴景斌抱有改错支左的幻想。决定成立“赴郴控告团”，走访军分区和在

郴州各工联派组织，张贴标语和印发《告全区人民书》，将“八一二”白色恐怖事件“真相”公布于众。在此之前，工联派批评武装部的大字报，包括批评武装部支左中犯错误的公开检讨，都没有具体点名，而以“资老谭”代之（源自省会称省军区司令为“湖老谭”，“谭”是指所谓“二月逆流”中的副总理谭震林）。这次决定《告全区人民书》点名，仿照湖南工联派“打倒龙刘崔，解放全湖南”的口号，第一次写出“打倒吴景斌，解放全资兴”。控告团还立即派员赴衡阳军队医院揪吴景斌回资兴算账。三人组成的“揪吴小组”中，“向阳”一号头头和文艺宣传队一名女队员是出于愤怒自告奋勇参与的。与这批人在郴活动的同时，县城掀起了围攻工联派新高潮，陆续揪了一批人，张贴各种标语和大字报，宣布“八一二”为“反革命抢枪”，欢呼“粉碎反革命集团暴行的伟大胜利”。在城的工联派也给予反击，县农具厂的组织贴出点名批评武装部设计陷害造反派的大字报。

从此之后，“八一二”是“发枪”还是“抢枪”争论了多年。其实用不着争，“八一二”后不过几天，武装部确是把一批枪发到了造反派手中，足证“抢枪”不成立。在当时，造反派持枪是中央首肯的。这年8月10日，由毛泽东亲笔批示“已阅，同意”的《中共中央关于湖南问题的若干决定》全文公开下达，其中第4条二款明确规定，“各革命群众组织应在湖南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的领导下，建立群众性的革命武装，保护国家财产，协助解放军维护社会的革命秩序。”此文下达前14天即7月27日晚上，由吴景斌在全城职工群众大会上传达总理周恩来代表中央解决湖南问题的指示中，就已明确讲了要用枪支武装革命造反派。资兴工联正是依据周的指示同吴景斌达成了发枪协议、并按武装部的要求将造反派中符合基干民兵条件者造册报给该部的。这样才出现了前面说的资兴‘八一二’。有了协议，又报了名册，坐等持枪就是，还用得着去“抢”吗？有关部门无视这些基本事实，后来利用“八一二”事件整过工联派头头、骨干多次，此是后话。

武装部首长当时和事后都未曾说过“抢枪”的话，也未承认过“挑动农民进城”。“发枪”、“抢枪”，两派各执一词，说哪一种也会遭来不满，自以不说的好；千多农民如何来的，自然也以“不知”为妙，因为当时中央有禁止挑动农民进城武斗的指示。1999年7月出版的《资兴志》却不再顾忌，挥笔这样记述“八一二”事件：

“8月12日，县城造反派和湖南煤校（即三都煤校）造反派共一百余人冲击武装部，抢劫枪支弹药，有关部门组织城厢、厚玉等公社一千余名农民进城制止，当场缴回被抢枪支弹药。”

这个记载显然是当年文革中的一派之言。资兴历届党政和武装部领导从未公开说过“八一二”是“抢枪”。相反，某权威部门却明确说过“八一二”不是“抢枪”是“发枪”。县公安局干部罗琛（后任县政法委副书记）曾在1974年春受县委之命参加“八一二”事件调查，他于1974年5月29日在公安局内多个单位参加的座谈会上亲口说：“我们调查了吴景斌政委（时在南县任职）、张洪臣部长（时

在江华县任职)，都说是发枪。吴景斌签了协议，张洪臣说是‘发枪武装产业工人造反派的基干民兵。’”罗琛重复说：“他俩一直到现在，是同意‘发枪’的。吴景斌是这么讲的，张洪臣也是这么说的。”那煤校“红大军”也并非为“八一二”而来，来前并未收到过资兴工联发给的电报。罗琛根据自己的调查结果说：“‘红大军’不是接了电报以后才来的。‘红大军’主要负责人李远翔等一车人在8月11日下午7时多已乘车到三都矿务局材料库，因枪支走火，把材料库的大铁门打了个眼。这批人离开材料库，就乘车来资兴。而电报是8月12日零点一刻才发出的，是发给煤校，当时李远翔等人已离校到了三都镇，未接到电报。”（罗琛上述证言已印发全县。）

按进入武装部现场的几个头头的共同说法，“八一二”当天，先经“部长约定”，后“排队进入等候”，再“参谋点名发枪”，对农民“打不还手，骂不还口”——这也真不像是“抢”了。《资兴志》说：“有关部门组织……一千余名农民进城。”明眼人一看便知，平时农民在上午9时还未收早工，不经组织，那千余人怎么会在如此早的时间从数公里外赶到县城集中？志书作者虽未将“有关部门”具体点出，读者却不难想到。当时党政瘫痪，除了“武装部门”外又有谁有此能力呢？不过，志书将“有关部门”多年讳言之事张扬开来，未必是上策。也许志书作者和审稿者以为此事有功无错才予以嘉褒肯定吧？殊不知：即使不说此举当时有违中央明令，今天来看，农民进城参与文革也属“内乱”啊！

说到多次利用“八一二”整人，要特别提到四年多后的清查“五一六”。1971年10月10日，县清查“五一六”领导小组炮制并上报了《关于乱军夺权事件的立案报告》，把“八一二”定为“反革命抢枪事件”，并写明“抢走轻机枪5挺、冲锋枪20余枝、步枪100余枝、手枪4枝、各种子弹2万余发。……分割围攻、谩骂、恐吓、推撞殴打……致使人武部参谋邓春福、部长张洪臣、副政委肖春圃当场昏倒。”以此报告为据，以剥夺自由的“学习班”为形式，集中15名造反派头头、骨干和亮相支持造反派的领导干部，分个住宿和专人尾跟监视，逼令交供“八一二”反革命事件的策划和执行“罪行”，时间长达数十天。上面提到的那位公安局干部罗琛，对“立案报告”出笼内幕一清二楚，又是主持清查“五一六”学习班的核心成员之一。1974年5月29日在公安局内多个单位参加的那个座谈会上，有人问“立案报告”罗列的抢枪数据和情节是怎样来的，他轻松地哈哈一笑，说：“那些材料是写立案报告时，人武部有人提供的，都是乱弹琴的！”

【蓦然回首】

我们那个老知青武斗队

唐士六

按：本文作者唐士六，是文革前由重庆下乡到四川省达县地区大竹县乌木滩渔场的老知青，文革中参加造反后成为一支以老知青为主的武斗队的负责人。后在清理阶级队伍、一打三反、清查“五一六”等运动中被以“指挥武斗、抢劫杀

人的罪魁祸首”罪名批斗、游街后关押审查，坐牢十年。1979年11月出狱。2004年从大竹县电力公司退休。他在回忆录中说：“我经历了这场‘运动’的全过程，每每回顾往事，还是那么清晰，而我心中就会感到阵阵疼痛。把这些经历写出来，对历史是尊重，对良知是忏悔，对人民和后代是交代，对自己是脱胎换骨的反省。”本篇摘自他的长篇回忆录《“文革”，我心中永远的痛》。主要讲述他和这支老知青武斗队所经历的一些武斗和遭遇的几次内讧险情。现标题是本刊另拟的。

抢枪拉起武斗“山头”

1968年2月，大竹县的“八一五派”把我们渔场的“反到底派”知青赶出了渔场，我们撤到达县，住进东风宾馆。

2月中旬，达县“造反军”决定要抢军分区设在达巴路口的军械库，开始两天许多人去围攻，守卫部队坚决不准抢枪，戒备很严，第三天中午终于被群众冲破了防线。那天我和渔场的男知青几乎都去了，在营区小路上与库房的军人对峙，军人都是全副武装。双方僵持了两三个小时，一个军官突然开枪，我身边的一个人应声倒下，群众一哄而散四下闪开，但很快又聚拢冲了上去。部队又开了枪，这次把渔场知青陈国文打死了，群众被激怒了，冲上去抓住枪就拖。部队不敢再开枪了，群众蜂拥而入，所有军械库都被砸开了，武器弹药被抢劫一空。

知青们把枪藏在东风旅馆的床下，部队连夜进行收缴，但只是走走过场而已。渔场知青这次一共抢了十七支步枪，一挺捷克机枪，一挺五六式机枪，一挺苏式转盘机枪，三支五六式冲锋枪，五支五六式半自动步枪，七八支手枪，还有一些子弹。云雾茶场和社办林场有几个知青也和渔场知青一起，也抢了枪。

好像就是当天晚上，不知是哪里的造反派抓到一个“奸细”，弄到东风旅馆活活打死了。我没有住在那里，而是住在铁山招待所与铁山林场的张德修在一起，我只看到这个人被打，不知道后来的事。

抢枪第二天，大竹““红联办””（八一五派的红色造反联合办公室）开了两车人到达县，被人告了密，达县造反军把他们抓到天主堂，有几个嘴犟的被打死了。我得到消息后赶到天主堂，制止了打人，向他们宣传“反到底”也是造反派，也是“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希望他们不要和我们作对，在他们口头保证以后，我说服造反军把他们都放了。这些人里面就有去年“10·23事件”中打我的人，我认识他们，后来这些人仍然要置我于死地。直到他们成为“四人帮爪牙”被捕或被打成“坏分子”受到“专政”。改革开放以后，我们之间才算没有矛盾了。其实我和他们也从无个人恩怨，都是“派性”闹的。

那几天渔场知青还抓到了大竹“汪氏政府”（乌木区最大的农民“八一五派”武斗组织）的二号头目尹德才，也是挨了知青一顿暴打，我赶到后把他放了。尹德才后来对渔场知青也没手软。

夜抢江水粮站

几天后在造反军军部召开联席会议，开江“6711”的头头邀请我们去开江帮

忙打“210”（对立派），但联席会议却决定我们去赵家（乡场地名）“驻防”。当天晚上，我就带着武斗人员乘车去了赵家，留在达县的女知青们不久便回了重庆。

在赵家场，我们住在小学校，达县造反军没有拨经费，全靠大竹“反到底”内部募捐的钱粮勉强维持生活。而我们在赵家对大竹的“反到底派”具有一种象征意义，“红联办”虽然也抢了枪，但暂时不敢对“反到底”采取行动，因为他们还不知虚实。我们熬了一个多月，造反军仍然不拨经费，眼看大家要断顿了，我狠心带着武斗队趁夜去抢了江水桥粮站，抢了一千多斤粮票和七八百块钱。这些钱我叫刘中文掌管，每天要记账。

于德河（大竹“反到底派”的一号头头）派人送信来，叫我代表大竹“反到底”去北京参加学习班，但刘世昌（大竹县“反到底派”农总司负责人之一）却抢先一步去地革委报了名。我考虑武斗队离了我，有些重庆知青可能会乱来，也就没有坚持去北京。现在看来这是错误的选择。刘世昌把事情完全搞砸了。

刘世昌是1967年12月才参加“反到底”的，以前他在观音场“反到底”分部。这个人文革前是吃了一些苦，在纸厂踩料，据他说是被当权派迫害的。他家属是二轻局的。刘世昌有一点文才和口才。我去宜宾开会由他代理“宣传部长”，很快他就把“农总司”几个头头拉成一派，主张极左路线，与刘业远一唱一合，干脆就把五十四军和“红联办”、“11·2”当成“反革命”，主张“反到底”一派掌权。我和于德河都不同意他的观点，他去北京前，“反到底”司令部专门开了会，决定要与“红联办”认真协商，只要对方承认我们是革命造反派，承认“红十条”，就可以实行平等联合。刘世昌接受了司令部的决定，但到北京以后就完全违背了决定，竟然不准7796部队和“红联办”的代表进学习班，他在其他地区“红十条派”（注：四川省以成都的八二六和重庆的反到底为代表的一派，因他们坚决保卫由《中共中央关于处理四川问题的决定》即“红十条”任命为省革筹组成员的刘结挺、张西挺夫妇，所以自称“红十条派”）中大肆造谣，诬蔑部队如何支持“红联办”残酷镇压“反到底”，纠集不明真相的人围攻部队和“红联办”代表，自然谈不上达成联合协议了。

夜袭清溪铺

我考虑先打掉区乡“红联办”的武斗组织，用他们的枪来扩大我的武斗队。1968年4月7日“夜袭清溪铺”，事前走漏了风声，结果在清溪粮站与“汪氏政府”接上了火，7796部队的一个班长跟我吵了一架，我见势不对，带着人就上了山，我用机枪断后，打退了搜山的武斗人员。当天我们取道八角庙一直插到文星。据说那天清溪有两个看热闹的妇女被流弹打死了。从位置分析应该 是被“红联办”的人打死的，因为我们在粮站，“红联办”的人是从水口庙下来和我们接上火的。我们没有向粮站后面射击。

为了不被“红联办”察觉，我们又撤到邻水县新正铺。过了几天，我与大安林场的蔡三蔡四兄弟等人联系上了，又与罗从周、廖学明老师等人商议，决定在山后搞一次行动。我们在周家和观音两个乡场分别搞了一次“戒严”，宣传“反

到底”的主张，抓了几个“铁杆八一五”，同心渔场和几个社办林场的知青和我们一起到了梁平县袁驿。这些行动没搞打砸抢。在周家抓的两个女孩其实并非什么“铁杆八一五”，就是嘴巴厉害些，有些知青对她俩殴打，我去制止下来了。后来这两个女孩都参加了“反到底”。

石桥铺夜袭突围

5月初我们又“夜袭石桥铺”。因侦察员谎报军情，我们摸到石桥粮站门口，只能从阳沟钻进去，刚进去三个人就被“八一五”一个起夜小便的武斗人员发现叫了起来，随即楼上就有人开枪，后面两个人迅速从原路逃回去了，只有我一个人跑到办公楼底层里面，看见楼梯口堆满麻袋，打不上去。楼上已经开枪，有人从大门进来增援，我用机枪和他们展开巷战，打完了一个弹夹，又换上一个。眼看陷入包围，我从窗户跳下，穿过菜地，楼上有人对准我的背心开了一枪（后来听说是7796部队的一个事务长，用手枪打的），刚巧凌晨下了小雨，土地很滑，我从右侧倒地，子弹擦着我的左耳钻进土里，溅了我一脸泥土。他们以为打中我了，谁知我一翻身对着楼上窗户打了一排子弹，在他们躲闪的一刹那我跳起来跑进了厕所，然后翻过院墙出去了。

我端着机枪硬是从“八一五”的工事前面闯了过去，工事里面的人被我机枪火力压制，一个个缩头趴在里面，我就从他们面前跑过去，跑一段又回头扫一梭子弹，边跑边打，到梁平地界碰到接应的人，我狠狠地批评了那个侦察员。

不几天，听说开江“210”在虎城（猫儿寨）与梁平“主力军”打起来了，我带着武斗队乘两辆卡车去增援“主力军”，赶到时，战斗已经结束了。在虎城区公所见到一个“210”的俘虏。我去了“战场”，看见“主力军”被打死的五六个人，有的双手都被枪弹打穿了。听参加武斗的人讲，开江“210”被“6711”赶出了开江，刘本固（“210”的头头，是转业军人）带着一两百人去大竹，虎城是必经之路，刘本固化装成生病的老太婆坐滑竿打头阵，“主力军”的哨卡没有警惕，制高点上没有安排强大火力，在盘查时哨兵被“210”打死，而且手心穿一个洞。刘本固带人冲了过去，“主力军”的大部分武斗人员才冲出来与断后掩护的“210”接上火，打了一阵就抓到一个俘虏。

我的人马没有打上仗，只好撤回。后来听说那个俘虏被枪毙了。当天晚上我们就和“主力军”一起撤退到梁平县城，住进了县委招待所。

潘允富之死

我的武斗队取名“301支队”，基本上都是重庆知青，与梁平“主力军”相比，算是武器精良、武斗有经验的一支队伍，梁平城里举行大的集会游行（庆祝“最高指示”发布之类），“301支队”就成了持枪走在前面的仪仗队。一开始梁平“主力军”对我们相当友好，在万县地革委给我们要来了“支左经费”，招待所内的生活安排得比较好。

大竹城乡开始驱赶“反到底”，于德河带着几百人从清河、柏林撤到达县，刘业远、朱云琪夫妇却到梁平来了，我们在梁平已有200多人。大概是我们到梁

平的第三天中午，刘业远在石桥分部发现了潘尤富，说他是大竹机关干部“八一五”的人，一定是“奸细”，叫“301支队”把他抓起来殴打，我在梁平武装部与“主力军”的头头开会，回到招待所发现在打人，就制止下来，刘业远向我说潘尤富在运动初期就是铁杆“老保”，后来参加“红联办”，一直跟“反到底”作对，这次来梁平肯定是来打探情报的。我问潘尤富是怎么一回事，他回答说他家在梁平，我们在袁驿的时候他就和石桥“反到底”在一起，和我们一道撤退到梁平，他回家了，今天是到招待所看朋友的。我觉得事情有蹊跷，刘业远是“反到底”的发起人，认识县里的干部多，他说的话总有一些道理，于是我命令刘光其（周家中学体育教师）担任“主审”，蔡三、樊修齐（都是大安林场知青）两个知青陪审，把潘尤富带到招待所后面一间房子里去，把问题搞清楚，其他任何人不准进去。然后通知各分部头头到会议室开会。刘业远以“反到底”老司令的身份发言，坚持说他了解潘尤富，是“铁杆八一五”，石桥“反到底”的头头刘世华、张胜忠、杨祖浩等人都不敢说什么，其他分部的头头则纷纷发言，要求进行“清理整顿”。会开到中间，有人进来报告说又有几个知青去参与打人，我立刻下去，看见蔡四、文兴国、常志刚等人确实在里面打潘尤富，我立即把他们轰了出去。然后专门把蔡三喊出来给他交代“千万不要搞出问题”，就又回到会议室去了。我讲话也是希望各分部要管好自己的人，有什么情况一定要及时汇报，事实上我当时连各分部头头都不熟，更别说下面的群众了。

我的话还没有讲完，我派去现场了解情况的杨祖浩进来对我说：“潘尤富小便失禁，可能不行了。”我立即结束会议去现场，看见潘尤富脸色苍白，头上大汗淋漓，蔡三等人在那里不知所措，我叫他们赶紧用床板将潘尤富抬到医院去抢救。晚上12点左右，有人回来报告没有抢救过来，已经死了。我带了几个把潘尤富抬到一块荒地上埋了。

刘业远到梁平，其实是来“夺权”的。他认为他是大竹“反到底”的创始人之一，是当然的“司令”，我让他跟“301支队”的知青接触，并表示我可以把指挥权交给他。当他看到潘尤富因他而死，山后“反到底”和武斗队都听我指挥，他根本插不上手，就灰溜溜地离开了。

潘尤富确实死得冤枉，从袁驿到梁平与我们天天在一起，我不认识他，不了解他；石桥“反到底”的头头又不敢理直气壮地站出来保他；加上我们刚到梁平，人员复杂，还没有理出头绪，我也是“两眼一抹黑”。当然，我也是有责任的，如果我坚决不准打人，或者只是把他隔离关押，等会议后处理，他是不会死的。

安置“第三势力”

梁平“主力军”的头头对“301支队”的武器垂涎三尺，他们竭力笼络我，几乎天天请我吃饭。我向他们通报了潘尤富的事情，他们表示完全理解。有一天他们告诉我，万县沙河子（县政府所在地）到了一批“大竹反到底”，有几十个人，但又没有“大竹反到底”的介绍信。我问他：“领头的人叫什么名字？”他们说：“听说叫达玉贵。”我明白了，是“11·2”的人。我叫梁平“主力军”通

知万县“主力军”，稳住他们。接着我就带了“301支队”开一辆解放牌货车去了万县。

“11·2”是大竹师范最先造反的红卫兵组织，“一月夺权”中与“工人兵团”共同成立“红联办”夺了县委县人委大权。“二月逆流”以后全部造反派都成了“砸派”，对达县“麻联司”和开江“210”等派组织进行武斗。重庆分裂成“八一五”和“反到底”之后，7796部队明确支持“八一五”，“大竹反到底”谴责这种“支派不支左”的行为，队伍迅速壮大，“11·2”从“红联办”分裂出来，宣称支持“红十条”，但又与“反到底”保持距离，被称为“第三势力”或“骑墙派”、“投机派”。1968年5月，他们也被“红联办”赶出了大竹，可他们没有“反到底”的身份，外地“砸派”不接纳，“难民”的待遇都得不到，很是尴尬。

我在万县党校见到了他们，蒋名荣副县长也和他们在一起，还有一些学生，总共有四五十人。我向万县“主力军”说明了情况，把这几十人全部带到梁平，对他们作了安置。但我去梁平“主力军”开会回来，发现“301支队”几个武斗人员在殴打蒋县长和达玉贵，立刻制止下来。我对达玉贵等人作了一次推心置腹的谈话，保证他们的安全，但要求他们只能承认是“反到底”，观点可以保留，不能在“反到底”内部挑拨是非，造谣生事。

从此，“11·2”一直跟我们在一起，直到“难民大返竹”。

梁平被围与万县“坐牢”

梁平“主力军”终于开口，要用“老套筒”（汉阳造七九步枪）换我的五九式半自动步枪和冲锋枪。开始提出两支换一支，后来增加到七支换一支，软磨硬泡三四天我都没有松口。因为我知道武器的优劣决定战争的胜负，决定士兵的生命，同时我也知道这种武斗是短命的，不可能长期持续，一旦我的“兵”多了，说不定会闯下什么大祸，我是承担不了责任的。因此我不想要更多的枪。

“主力军”恼羞成怒，一天下午突然派大批武斗人员包围了招待所，不准我们出去。我知道是为什么，但我可从来是服软不服硬，从不在强权面前低头。我立即下令关闭招待所大门，“301支队”进入备战状态，在房顶上架起机枪。“主力军”向我提出“交出枪支弹药，礼送出境”的最后通牒，我明确答复：“交枪不可能，要打就打，主力军必须承担自相残杀的全部后果。梁平不欢迎我们，就到万县地革委评理。”

双方僵持了两天，驻梁平的空字028部队红总（成都军事院校的八二六派）人员和县人武部出面调解，同意我们离开梁平去万县。大队人马第二天便浩浩荡荡乘车去万县，在沙河子住了下来。

到万县第二天，万县“主力军”头头熊道生（当时已是万县地革委副主任）便通知我去高笋塘“主力军”总部谈话。年初传达“全川‘红十条派’宜宾会议精神”时我和他见过面，年龄差不多大。我详细汇报了梁平的全部情况，他说梁平“主力军”控告我打砸抢还杀了人，地革委很重视，要调查，要委屈我在军部住几天。我自然是欢迎调查，于是便被关进了“主力军”关押俘虏的临时牢房。

一个大嫂和一个姑娘专门负责我的生活，我和她们讲我的经历，很快就成了好朋友。

大概是一个星期左右，调查结束，沙河子的三四百名“反到底”群众实事求是地反映情况，证明梁平“主力军”对我的指控全是不实之词，我被释放，许多人都来迎接我。

沙河子演讲

当时我在沙河子就是大竹“反到底”的最高领导人，许多事情都必须由我作决定。我首先把城里司令部的人和各区分部的负责人进行了整合，建立了政宣、后勤、保卫、联络四大机构，各基层组织的“难民”必须集中住在一起，坚决不准违法乱纪之事发生。我就亲自驱逐了几个作风不好的女人。万县地革委按人头每月拨付“支左经费”，每人每天一斤米和二角五分钱（俗称吃“一二五”），还有肉票、酒票、烟票、油票、盐票等，我们干政（治）宣（传）武斗的经费就靠虚报人头，地革委睁只眼闭只眼。多余的钱和粮票必须我批准后才能支付。武斗人员和宣传队员的饮食标准要高一倍。我叫后勤到百货公司联系买了一批包装布（不要布票而且很便宜又结实）染成灰色做“军装”，发给宣传队员。政宣部的纸张笔墨保证供应。

经过一段时间整顿，沙河子“难民营”的秩序很不错了，陆续还有逃难的“反到底”群众到万县来，很多是全家人逃出来的。人一多，难免就会有各种小道消息搞得人心惶惶，领导班子开了一个会，决定召开一次全体大会，由我作报告，廖学明老师当秘书，起草稿子。

这次报告其实就是演讲，主要是用党中央、中央文革的政策文件和毛主席“最新指示”阐述“反到底”的革命性、正当性，以稳定人心。在谈到中央学习班时讲到大竹文革的历史和特殊性，肯定 7796 部队支左的成绩，指出今后的发展趋势必然是革命大联合，因此我们“反到底”的政策应该是欢迎所有革命群众参加进来，不应搞极左，自我封闭。

这次演讲的内容，其实是我几次与于德河通信商定下来的。于德河是一号头头，他的信息是比较准确及时的。刘世昌在北京以大竹“反到底”特别授权代表对 7796 部队和“红联办”的极左态度已经严重损害了“反到底”的形象和声誉，堵塞了两派谈判联合的道路，促使 7796 部队采取“支派不支左”的一边倒政策，也为“反到底”今后的内部分裂埋下了祸根。我的演讲其实就是对刘世昌不点名的批判。

迎接北京学习班代表

不久，从达县转来了一封刘世昌写给“农总司”头头的亲笔信，上面明确地写着“对重庆知青只能抛弃不能姑息”这样一句话。紧接着“吹胡子”（大竹乌木滩渔场一个重庆知青的外号）他们也给我写了一封信，信封里装了一颗手枪子弹，信上说刘世昌对重庆知青如此攻击，要我枪毙刘世昌。如果我也是“头脑简单四肢发达”的人，以我当时的权势完全是可以办到的。但我认为刘世昌的观点

是有代表性的，重庆知青当中确实有一些“害群之马”，偷摸扒窃打架斗殴满口脏话，这些人在重庆就是“顽劣儿童”，缺少家庭教养和文化，生活在社会最底层，他们是一群流氓无产者，根本不能叫“知识青年”，因为他们没有“知识”。与其说他们本质不好，不如说是教育政策和社会政策的失败。这群人把整个“重庆知青”的名誉抹黑了。大竹“反到底”最先的中坚力量就是知青，没有他们冲锋陷阵，“反到底”是不会迅速发展壮大的，他们同样是造反最坚定最彻底的力量，应该用一分为二的观点去分析，刘世昌这种绝对化的观点是错误的。

北京学习班结束后，刘世昌没有和达县地区代表团一起回来，而是和万县地区代表团到了万县，住在高笋塘地委招待所。我估计他害怕先回达县，在司令部他势单力薄，会遭到严厉批判。我是驻万县的头，又是重庆知青，他想先拉拢我。

我带着两个“警卫员”去地委招待所，刘世昌一见面就非常热情地讨好说：“老唐，在北京研究县革委名单，我给你报了常委。”我没有理会他，直接问他：“你说对重庆知青只能抛弃不能姑息是什么意思？”他矢口否认，我把他的亲笔信放到桌上，他一下子傻眼了。接着我把那颗手枪子弹也放到桌上，明确告诉他重庆知青要他的命。刘世昌顿时脸色煞白，浑身发抖，结结巴巴地讨饶：“老唐，我错了，我不该那样写，我保证一定改正，请你相信我，给我一个机会。”我严肃地对他说：“为了大局我可以放过你，你到沙河子传达北京学习班精神，不准乱说，必须按中央精神正确传达，否则我新账老账一起算，随时要你的命！”刘世昌满口应承。

我先回沙河子，布置会场：“热烈欢迎赴京代表胜利归来！”在汽车上也贴了标语，敲锣打鼓去把刘世昌接到沙河子。刘世昌在传达中果然不敢乱说，不时扭头看我的表情。传达以后，我就安排人把他送到达县去了。我不能让他在沙河子扰乱军心。

刘世昌从此把我恨入骨髓，视我为心腹大患，几次欲置我于死地，这是后话。

奔袭双河场

“吹胡子”等人在重庆听说我们在万县已经安营扎寨，就一窝蜂涌到万县来，幸好刘世昌已到达县去了，否则很可能会有危险。我深知“吹胡子”这帮人的德性，在万县他们是不会安份的，经过认真思考，我对“301支队”作了调整，任命“吹胡子”为支队长，两辆卡车归我指挥，把武斗队拉到垫江县城，准备袭击大竹县的石子、文星、周家等地，建立“根据地”。这只是一个冠冕堂皇的借口，真实目的只是为了把这些知青与“大部队”隔离开，以免惹出事端，运动后期我承担不了责任。这些知青在我的掌握中是不会出大问题的。

在垫江县城的第三天，城里赶场，站岗的知青发现一个形迹可疑的人在我们驻地（一家旅馆，是垫江“忠实兵”总部安排的）东张西望，便把他抓了进来。我亲自审问，这是一个三十岁左右的癞子，说话是大竹山后口音，他自称姓沈，是石子乡的农民，没有文化，讲起话来吞吞吐吐，前言不搭后语。他说想去解手，我就叫一个知青押着去厕所，谁知他一下跳进粪坑，想逃跑。这个粪坑是封闭的，

他没有跑出去。我只好叫人把他拉起来，用水使劲冲，还是臭不可闻。我断定这家伙决不是什么好鸟，就派人把他捆起来送到垫江县公安局。后来得知这个人叫沈祖提，是当时所称的反动组织“接产党”的联络员。1970年在大竹被枪决。我被关到看守所以后见过他，枪决的那天早上亲眼看见他被押出去，那天一共枪毙了四个“接产党”。

我在地图上查到距东印农场最近的场镇是双河场（现天成乡），决定打双河。行动前向全支队人员交代任务：首先占领公社和粮站，收缴“八一五”的武器，遇到抵抗就开枪。不准打砸抢更不准随便开枪杀人。行动结束立即原路返回。

我们乘车到东印农场，留下司机和两名武斗人员，然后从小路直插下去，没有遇到抵抗，很快对全场实行戒严。在公社和粮站搜查，收到两支“老套筒”和宣传队用的锣鼓。当我从街上走到供销社门口，听见里面有声音但大门紧闭，我去叫门，没人开，我生气了，一下把驳壳枪上了膛，高声叫道：“再不开门我开枪了！”仍然没有动静，我就向大门上开了一枪，门才开了，是李开源开的门，我那一枪正好从他头皮上飞过去。我看见里面几个知青正在抢布匹钱票，我气极了，端着枪厉声命令：“都给我放下！谁不放下我枪毙谁！”机枪手也闻声进来了，我命令他准备射击。这几个知青面面相觑，只好都把东西放下，乖乖地退了出去。我叫人把大门封了。

回到垫江，“三娃子”给我送来几百块钱和几百斤粮票，说是在双河粮站抢的，“吹胡子”叫他上交。我说：“行动前我就宣布不准打砸抢，我带了足够的经费，你们为什么还要抢？这些我不收，你给‘吹胡子’拿回去！”从此，我跟“吹胡子”那批知青也结下了仇。

新胜遇险

正好万县方面派人来联络，说于德河叫我们去达县，万县的人也将全部去达县。我叫来人把锣鼓给宣传队送去。随即我们就移师达县，从此没有在大竹境内搞武斗。

我们两辆车在路经梁平县新胜公社时，突然发现“主力军”在路上设卡拦截，场镇临公路一面修筑了工事，武斗人员个个荷枪实弹，杀气腾腾。我立刻命令：“汽车不要熄火！全部下车抢占有利地形！”知青们立刻散开，在田坎土包大树下趴下架起枪。我提着上了膛的手枪站在公路上向对方喊话：“我们是大竹反到底的！到达县去！你们为什么不让通过？”对方答话道：“知道你们是大竹反到底！上面有命令，叫你们留下武器才准放行！”我说：“要我们交枪绝对不可能！要打就打！老子立刻踏平新胜！”说完我就闪到汽车一边去了，轻声命令慢慢接近。

对方见我们摆出了真打的架势，而且是武器精良训练有素的一帮亡命之徒，他们是绝对打不过的，急忙喊道：“你们等一等！我们再请示一下！”几分钟以后，对方喊道：“欢迎大竹反到底到新胜作客！我们准备了酒菜给你们接风！”对方阵地上的武斗人员齐喊：“向大竹反到底学习！向大竹反到底致敬！”我命令全体武

斗人员站在汽车两边，缓缓前进，枪支全部上膛，一边走一边高喊：“向梁平主力军学习！向梁平主力军致敬！”到新胜场口，我命令全体向天鸣枪，以示敬意，其实是示威。直到走过射程，才上车全速前进。

达县“整风”

到1968年5月底，大竹“反到底”的“难民”已达2000人左右，其中在达县的是大部份，宣汉县城有两三百人。司令部的头头大多住在地区展览馆。刘世昌的家属、女儿也在达县，他四处活动，用封官许愿的方式把“农总司”的几个头头拉了过去。他们的主张就是“消灭‘八一五’，‘反到底’一派掌权”。这个主张根本不可能实现，但诱惑力极大，刘世昌几乎就把自己当成“大竹革委会主任”了，各局委办的头头当然就是“效忠”他的那些人了。这些人制造各种流言蜚语在“难民”中传播，搞得人心惶惶。于德河察觉了这些危险的倾向，认为必须在司令部领导班子中进行整风，统一认识。当时司令部里还有陈代昌、邓超清、谢远发、杨通文（红卫兵）等“勤务员”，廖杰、张祥福等干部包括隋佃甲、蒋名荣等县级领导干部都是“反到底”的“顾问”，我是“枪杆子实权派”，当然赞成整风。于是司令部在地区农展馆进行了一周的整风学习，每个头头都要作自我批评，也要对司令部的方针路线提出看法和建议，可以展开辩论。刘世昌在北京学习班的表现和底下搞的极左受到了严厉的批判，会上一致决定任何人不得拉帮结派搞非组织活动另立“山头”，刘世昌也是举手同意的。这次整风还有两个决定，一是民主改选领导班子，于德河是一号，刘世昌二号，我三号。二是把“难民”中的青壮年男人尤其是退伍转业军人编为一个民兵营，下辖五个连，除“301支队”直属司令部外（没有人敢提出夺我的“兵权”，刘世昌想提又不敢提），各区分部的武器都要归民兵营管。廖忠发是转业军人，被任命为营长，所有武斗人员都归我指挥，我是“总司令”。于德河、陈代昌、廖杰等人都支持我，因为我没有野心，没有裙带关系，作风正派。于德河把司令部的公章也交给我，因为有人已放话要“夺权”，放在我这里最安全，谁也不敢惹“301支队”这帮亡命徒。刘世昌虽然是二号，那是在选举时让给他的，只为维护司令部的团结，照顾他的脸面，其实他一点实权也没有。

我就更忙了，“支左经费”要我审核盖章，确定分配比例。我还得经常去“难民营”（达一中、四完小、八完小等）巡视。

经过整风，难民中秩序归于正常。

凤凰山激战

整风刚过，“新联司”（达县原保守派，以后加入“八一五”，成员大多是产业工人，很有战斗力）从石板北上进攻达城，双方在凤凰山上展开激战。达县造反军以部分兵力在凤凰山上牵制对方，精锐则从侧翼迂回包抄。我们这些“杂牌军”就被派到凤凰山上。

我们的阵地挖有深及半人高的堑壕，“新联司”比我们高一些，双方相距不过一两百米，枪声时密时疏，枪弹在头上嗤嗤飞过，机枪尤其是高射机枪是很厉

害的，每每在我们阵地前后土地上溅起泥沙尘土。我们依托工事向对方射击，瞄准，勾板机，我一个人使三支枪：苏式步枪、捷克轻机枪和三八大盖，手枪没用。我时时变换位置进行射击，跳来跳去，心中一点也不觉得害怕。

中午时分，“反到底”白坝分部一个姓朱的小伙子背靠掩体坐下休息，他距我只有一两米，我正在专心打枪，突然听到小朱大叫一声：“哎哟！”我扭头一看，他双手紧紧捂住右眼，血从指缝流出来。我迅速跑到工事后面喊人，把他扶了下去。经医院X光照片，他右眼眶头骨上嵌了一颗弹头，原来是“新联司”射过来的枪弹从他对面的石头上弹回来，恰恰钻进他眼中，这人也够倒霉的了。直到两年后他才在省医院做手术取出了弹头，右眼当然也瞎了。

这次武斗打了一整天，傍晚时分，“新联司”遭到造反军侧翼的猛烈夹击，只好仓皇撤退。

广元抢枪

6月中下旬，我们得到信息，“红十条派”准备到广元抢枪，那里有成都军区的一个很大的军火库，可能还有导弹。

刘世昌极力主张去广元，廖忠发等人也极力附和，很明显他们是准备把“民兵营”尽快武装起来，刘世昌就是急切地想拥有他能控制指挥的武斗组织，进而夺取大竹“反到底”的最高权力。于德河叫我带“301支队”一起去，用意也很明显是要制约刘世昌，不让他坐大。

我们两车人取道草坝、通江直扑广元，表面上的总指挥官仍然是我，武器和财权都掌握在我手上，大竹“反到底”的证明文件也在我手上。但刘世昌和“农军”对“301支队”和我采取的是敬而远之的态度，有明显的隔阂，大家心照不宣。

我们住在广元河西粮站，“301支队”和“农军”各住一边。我要求“吹胡子”每天要进行操练，加强纪律教育，在开会时也一再强调我们是革命造反派，不是土匪，必须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但“吹胡子”阳奉阴违我行我素，成天与知青们搞赌博。我与“吹胡子”吵了几次，有一次差点动武。我更不敢把刘世昌的阴谋告诉他们，依他们的脾气，肯定会把刘世昌撕成碎片，“农军”的头头也要遭殃，我能逃脱干系吗？所以那一段时间我心中很苦很矛盾。

广元抢枪还是发生了，遗憾的是根本没有枪可抢，我们抢到了两车弹药，只能尽快返回达县，用子弹换枪。

通江内讧血案

两辆车离开广元，到巴中时，驾驶员说要修车，就开到汽修厂。吃过午饭，我和“吹胡子”又吵了一架，他扬言回达县再跟我“算账”。

刘世昌叫我去巴中城里拜会当地最大的工人造反军，见到一个叫“猪头小队长”的头头。刘世昌提出请他们“解决”知青武装，我当即反对，我的意见是可以解除知青的武装，把他们送回重庆。“猪头小队长”表示无能为力，也就算了。

我没想到，我返回汽修厂后，刘世昌和“农军”头头又返回去找“猪头小队长”，这次他们谈妥了条件：伏击知青汽车，武器弹药全归巴中方面。刘世昌特别提出，伏击时一定要将我干掉。这一切我都被蒙在鼓里。

知青车的司机说他们的车还要修一会，“农军”的车先走通江“打前站”。就在“农军”车发动后，我突然决定跟“农军”车走，带着警卫员就上了车。直到现在我都不明白当时我怎么会有一种突然的令刘世昌始料不及的决定。

我们在通江吃过晚饭之后，通江造反军派人送来噩耗：知青的汽车在进入通江县境不远的一段夹皮沟峡谷时突遭伏击，在枪林弹雨中知青们毫无还手之力，当场打死两人，轻重伤多人，知青们被迫“投降”，枪支弹药全部被收缴，“打扫战场”的武斗人员公开告诉他们：“是你们的头头叫我们来伏击的，不要怪我们下手太狠！”知青们真是欲哭无泪。两个死者是文兴国、陈豪，是同心渔场的。这两个人在广元时就跟我说不想呆在“301支队”，想回重庆去，可惜他们的愿望还未实现就成了冤魂。樊修齐的腿被打断了，回重庆后截了肢。朱家福、陈金生等人都受了伤，“吹胡子”命大，他和司机在第一时间滚出驾驶室躲到车底幸免于难。

1970年，“猪头小队长”和万源造反军的“郭大麻子”（郭干明）分别被捕，他们才交代出刘世昌和“农军”头头与他们密谋伏击的内幕。在此之前，刘世昌到处散布谣言甚至写黑材料，把全部罪责推到我头上，知青们不明真相，一直要找我“报仇”，幸好我的警卫员毛刚钦（观音场的知青）实事求是地讲明真相，知青们才知道误会了我。

【旧闻杂记】

我知道的几个武斗杀俘案

谢声显

按：本文作者文革中曾在四川省万县市（今重庆市万州区）被打成“反革命”关进监牢（详见《记忆》总第57期《我怎样被炮制成“从严对象”》），他在狱中和进监狱之前的“学习班”里，认识了几位因在武斗中杀俘而遭到指控的人，既有保守派（红色派）的，也有造反派（主力军）的。他在回忆录中如实记述了这几件杀俘案。现标题是本刊另拟的。

冤冤相报杀了民兵连长

在我被关进去的16仓（注：当地称牢房为“仓”），有一位狱友叫高洁。他本名涂富贵，精瘦的中等个子，面黄嘴尖双肩微伛，他是铜鼓山上一个进城读过高中的贫农子弟。

在涂富贵读高一那年，正逢“三年特大自然灾害”最严重的时期。上面来了政策，农村学生一律清退回乡生产。铜鼓山虽离城仅十几里远，但山高坡陡路难

行，直到上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后，才修通了一条机耕道。当时，返乡知识青年涂富贵虽然每个劳动日只挣1角2分钱，却是全大队唯一自费订了份报纸的人。20岁生日那天，涂富贵写了一幅“寒窗高卧与云平，江水长流洁复清”的对联贴在门口自贺，同时仿古人取表字为高洁。

文革初起，高洁成了“散布封资修毒素的牛鬼蛇神”。官办的农民红卫兵抄了高洁的家，还天天押着他跟地、富、反、坏、右分子一起，戴高帽挂黑牌自己敲着破锣游田坎。凡经过有人的地方，都得大声喊：“我是牛鬼蛇神涂富贵……”

高洁毕竟是个天天都认真读报的人，觉得像自己这样返乡生产的贫农子弟，闲暇时讲过一些报纸上看到的東西犯了什么法？在这一点上，他与我有共同的经历。但不同的是，他家庭出身好，有政治本钱使他更敢于斗争。

一个月黑风高之夜，他逃进城去寻找公理与中央精神。

几天后，高洁穿了一身仿制的绿军装，左臂上戴一个红袖章，挎着一包油印的传单，雄赳赳气昂昂地赶回山上拉队伍革命。

从那时起，高洁连自留地也不刨了。他成了农村的职业革命家，整天率领着几个青年农民夜以继日地写大字报，在高高的山岩上用石灰刷一些气吞山河的大标语，壮烈地向生产队和大队还有公社的“走资派”开火。

不久，城里的武斗升级，自然也波及到铜鼓山上。高洁那小小的农民造反团被大队民兵连长率队一鼓而歼，尽皆落网。

高洁受伤被俘后拒不转变立场，一经提审便大呼：“毛主席万岁！共产党万岁！”气愤的红色贫下中农们就像现在那些黑心贩子给生猪注水一样，用凉水灌得高洁腹胀如鼓。高洁说，民兵连长用指头在他肚皮上一弹，口鼻内便有水直外冒。高洁还被吊过鸭儿凫水，双手被反绑着两脚已经离地了，又给他脖子上挂一扇石磨盘，几乎将颈椎吊断……即使如此，高洁仍声嘶力竭地宣讲“革命无罪、造反有理”，誓死不降。民兵连长束手无策，叹道：“这龟儿子，真是咬他脑壳硬，咬他屁股臭。”

此时城内的武斗虽然还停留在冷兵器时代，但却愈演愈烈。民兵连长奉令率农民军入城打“翻天派”（他们对造反派的蔑称）。临行前，民兵连长将高洁关进了山头上一座旧碉楼，派了两个年老有病的民兵看守他，说等运动后期再处理。

他的妻就拖着两个小孩种地做家务，每天还要给丈夫和看守丈夫的两个民兵送吃喝。

两个多月后，秋老虎肆虐。那天晚上，碉楼内闷热难耐，两个看守也不见了。后半夜，下面村子里突然人哭狗吠乱成一团。高洁的老婆披头散发跑上山来，气急败坏地用石头砸开了铁锁。她喘着气断断续续告诉丈夫，支左部队给造反派发了枪，进城去的农民军只有钢钎大刀，打输了，光我们村就抬回来3个死鬼，还有好几个伤员，连长说了，后天烈士入土时杀你祭坟；村里乱翻了天，那些屋里死了人的婆娘正扭着干部哭闹拚命……

高洁本来对此形势已经准备了3种以上的应付方案。但事到临头，他也只顾得上拍了拍妻子瘦骨棱棱的肩，说了句你快回去。转身便朝茅草丛生的后山上窜。

5天后，高洁扛着一支汉阳造步枪杀气腾腾地回到了铜鼓山。高洁没遇到任何抵抗，他在大队部门前朝天“砰砰”放了两枪，旧部们便提着大刀钢钎回到了他的麾下，马上便恢复了组织。

一直忙到半夜，高洁才又累又饿地回到家里。他接着被民兵连长打伤后还躺在床上起不来的妻洒了几滴眼泪，又看了看空荡荡的羊圈和鸡窝。他连女儿捧过来的水都没喝一口，便铁青着脸咬着牙，提着枪奔回了他的司令部。

第二天晚上，高洁根据一个放牛娃的举报，带人从后山的岩洞里抓回了民兵连长。

第三天早上，人们发现了被扔在山沟里的民兵连长。他口里塞着自己的背心，浑身青紫早已没了呼吸。

我进监狱时，高洁已被捕一年多了。刚进监时，他妻子来送过两双草鞋和半联肥皂。从那以后就没再来过。这样久没有外面的接济，不光使他成了全仓最困难的人，也使他成了全仓精神负担最重的人。得不到任何亲人的信息，他的心一直在为病妻和一双未成年的儿女受着煎熬。夜静更深之时，偶尔听到他从睡梦中发出的那一声长长的哀叹，真是撕心裂肺。

高洁最后被判了8年，他刑满获释后回到了铜鼓山，那时土地早已分下了户，历史已进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高洁有了用武之地。没几年，他就成了铜鼓山先富起来的农民之一。他每次进城，都会到我家来坐一会儿，喝着茶谈天说地。

农民富了便要修祖坟建新房。高洁也未能免俗，他修了祖坟再建房。

就在动工的第4天晚上收工时，屋基都快下好了，众人才发现基脚还差一块条石。

铜鼓山的男劳力个个都会干石工活。高洁虽然已进入小康，但本质上还是个农民。那天晚上，秋月当空，月辉黯淡地瑟瑟摇动，似笼罩着团团的寒气。秋云在夜空中弥漫四散，被晚风吹得如丝如缕，渐渐淡远。

高洁被自己开下来的那块条石压住了胸部，口鼻喷血，当场身亡。

不怕说他杀人而怕说他枪法不好

迟万全个头不高，浑身皮肤黝黑，结实得像个秤砣。他没念过多少书，但特别爱听故事，他的学校是码头边上那座临江的草棚茶馆。他心目中最大的知识分子就是说书人吴瞎子。他对吴瞎子的崇敬仅次于伟大领袖，经常挂在他嘴边的就是“吴瞎子说……”，吴瞎子的言论多年来几乎成了他的人生信条。1965年，迟万全刚满17岁，就被安排进一家内迁的军工厂去搞基建。

武斗时，迟万全的左眼被手榴弹的弹片炸瞎了，从此人们便叫他独眼。

1967年秋，大规模的武斗告一段落后，独眼这一派的勤务组在厂食堂里召集全厂职工开过一次“公审大会”。临散会时，杜司令在台上庄严宣布：“……本厂勤务组，依法判处现行反革命分子、杀人凶手杨京志死刑，立即执行！拖出去！”

独眼就和另外两个“战士”一道，将前天俘虏的本厂红色派杨司令押到篮球场上，在几百人的围观下，立即执行了死刑。

进看守所后，公检法军管会的代表曾在预审时问过他：“你为什么要杀人？”

“他被判了死刑呀！还出了布告，盖了勤务组的‘跺儿’（大印）的。”

军代表研究过独眼的档案，对根红苗正困苦中长大的孤儿有几分同情，不但没发怒反而面带微笑提了一系列问题，说：你左眼刚受伤不久还包着绷带，只剩一只右眼对不对？杨京志倒地之前连中两枪，一枪打在左脸一枪打在右胸，而你用的是中正式步枪，打一枪后就必须拉枪栓退弹壳再上膛击发，那么短的时间内怎么可能两枪都是你一个人打中的？你不要傻乎乎地一个人兜着。

独眼坐在预审室中间那半截埋于地下的水泥墩子上，他仰视着桌子后面，实事求是地据理力争，说两枪都是自己打中的。看军代表不相信，他竟然还提出“借支枪来我表演给你们看”。他这荒唐的要求理所当然地遭到了拒绝。

回仓后，迟万全着实叫了半天屈。他不识好歹气呼呼地骂：“那家伙硬不相信老子出枪有这么快，他还说他是当兵的也在玩枪。他龟儿当的少爷兵，打过几发子弹？”独眼说，当时，那两伙计虽然先开枪，但因为杨癞子面对我们站着，一对二瞳鼓得像牛卵子那么大，又扯着喉咙在喊口号，那两伙计就有点心慌手抖，两枪都打飞了。围在旁边看的人都还活起的嘛！老子头一枪打进他的脖子，趁了那淫贼朝前栽的时候，老子第二枪就打飞了他半个脑壳。当时好多人都给老子拍巴掌喝彩，杜司令还奖了老子一瓶五粮液。

他们的杜司令就关在第5仓，因“指使杀人”罪，后来被判了15年。独眼因“派性杀人”罪，同时被判了10年徒刑。许多受人指使犯了“派性杀人”罪的，杀一个人多数只判3年，还有判缓刑的。从同样是杀人犯而所判刑期的轻重，也体现了当年“问题不在大小，关键在于态度”的原则。

听说独眼刑满释放后，在长江边开了个小饭店，早已娶妻生子。

革命委员会决定公审杀俘

还有指挥杀人的汽车49队革命委员会主任徐世辉，他是一位四方脸浓眉大眼仪表堂堂的转业军人。汽车49队的原保卫干事是红色派的骨干，在“二月镇反”和武斗时与徐世辉他们结怨很深。武斗结束后，49队的主力军抓到了保卫干事，勤务组就开了个会，宣判保卫干事死刑并立即执行了。1968年，勤务组的5个成员都进了革委会。

1970年，汽车49队革委会的5个成员都因此案被抓进了看守所。当年，单位勤务组开会决定枪毙人的事比比皆是，但像49队一样，参与开会的人全抓进来，最后还都判了刑且判得那么重的，在万县市可能也只这一个单位。“问题不在大小，关键在于态度”，量刑就这么个标准！徐世辉后来被判了20年。

他在硫磺厂劳改时，汽车修理场发生了一次火灾。据说，徐世辉本可以逃生的，却主动返回去救管理人员的孩子。警察的儿子被救出来了，他却被烧死了。为此，监狱破例地为徐世辉开了追悼会，全体警察都参加了。

胡大个子的杀俘理论

还有个我在坐牢之前的学习班里的“同学”，另一个厂的前革命委员会主任胡大个子，他的案情很清楚：武斗结束后，他主持厂勤务组开了个会，“正式”判处了本厂一个对立派头头的死刑，然后一本正经地在食堂里召开了全厂职工参加的“公审大会”，会后当场对其执行了死刑。还出了布告，盖的是造反派的“战团”大印。他犯事的整个过程很“透明”，哪些人开会决定的、哪些人执行的，人所共知清清楚楚。胡大个子也完全承认有这么回事儿，但他就是坚决不肯认罪。专案组就不断地给他加温，他也不大声争辩，就只咕咕噜噜地反驳。

胡大个子年纪比较大，进学习班时，他可能已是40多岁的人了。他的老家距城里约20多公里，据说自幼父母双亡，上无片瓦下无寸土，成份是最革命的贫农。1948年的某一天，胡大个子闲来无事转到乡场上，准备去卖掉夏天在山上挖的药材，换两个钱买点酒喝。却不料正碰上李保长带着兵在抓壮丁，就将胡大个子一绳子捆进了师管区。稍作训练后，壮丁们便被送进了部队。胡大个子因为年青力壮身躯魁梧，就分派去给机枪手背子弹，说是叫副射手。胡大个子说，在国军里还是经常吃不饱，饿肚子。几经辗转，胡大个子随部队开往前线。到了目的地徐州，胡大个子记得很清楚，他说自己驻扎那地名叫碾庄。我们这些识得几个字的人，都知道淮海战役中这个著名的村庄。胡大个子说，自己在碾庄一枪未放便作了俘虏。被“解放”过来后，吃了几天饱饭，就有政工干部来动员出身贫苦的俘虏参加解放军，说是胜利后可以回老家分田分地，天天吃白米干饭。胡大个子一听这美好前景便提高了觉悟，马上站起身来报名参军。胡大个子说，参加解放军后，我们连军装都没来得及换，只是扯掉了头上的青天白日帽徽，就分下了连队，当晚便拿起枪向国军发起了进攻。胡大个子作战勇敢，半年过后就当上了班长。1949年12月8日，万县市和平解放，班长胡大个子是提前一天进了城的便衣队员。不久，胡大个子成了副排长，挎着驳壳枪被派回老家的乡公所作军代表，领导本乡的“土改”和“清匪反霸”。后来“抗美援朝”，胡大个子又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去与联合国军浴血奋战了几年。也是他福大命大，战场上立过几次功，也受过几次伤，但都没伤筋动骨。停战回国后，组织上还将胡大个子送进东北的一所军校，准备进行培养。但胡大个子说，我真是目不识丁，个字不识，再加上那时二十好几了，特别想找女人。他说，我连坐在教室里，眼睛就很少望讲台，老盯着楼下那些穿花衣服的过路女人。胡大个子在军校里实在学不进去。他说自己目光短浅地闹着退了伍，拿了两百块复员费，就回到了万县市。他说那时候的人真是老实，复员回乡时没因自己为这政权流过血立过功便给政府提要求讨价还价。他同当年那些真正经历过战火的复员军人一样，返乡后自谋职业，进了当时还是私营的酱园厂当了个工人。胡大个子很快就如愿以偿，找到个女工结了婚。文革中，工厂里一开始组织战团，胡大个子便参加了主力军。由于他出身贫农，又是革命军人，虽然没有文化，却根红苗正，理所当然地便被选成了头头。武斗开始后，胡大个子又因为有实战经验，就当上了武斗队的连长。成立革委会时，他顺理成章就当上了主任。

对“指使杀人”一事，胡大个子一直不肯认罪。任何人一听这话，都觉得

他实在是横不讲理。当我亲耳听见胡大个子不肯认罪的理由时，也觉得很是新鲜。胡大个子说：老子在五零年时，就将李保长等好几个家伙抓起来，开了个公审大会就枪毙了。当时老子不过才是个副排级！但过去 20 年了，从来没人问老子有没有权力杀人，理抹过老子是不是杀错了。老子后来当了连长，又升了国营厂的革委会主任，都说这主任起码是正营级。怎么官当大了，还没权力杀个把反革命分子？工作人员都说，胡大个子仗着自己的贫苦出身和革命经历，故意胡搅蛮缠。

后来，彼此多了些了解，我也才明白了，不识字的胡大个子并非简单的胡搅蛮缠，而是由于他的亲身经历，才令他产生了这种认识。因为没有文化，他就更固执于自己的亲身体验。胡大个子从内心深处真诚地认为：我年青时，跟着某某干革命，参加了用枪杆子夺取政权的战斗，打赢以后，为了巩固政权，虽然只是个小小的排副，也有权用武力将被打败的一方从肉体上进行消灭。中年时代，我又响应某某亲自发出的号召，跟着他干革命，又参加了用枪杆子夺取政权的战斗。最后打胜了，我的官当得更大了，为了巩固“新生红色政权”，更有权用武力将被打败的一方从肉体上进行消灭。何况被枪毙的家伙还同自己真枪实弹地干过多次，“罪恶”比仅抓过他壮丁的李保长大得多。

青年时代便接受的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教育，已在他的头脑里根深蒂固。

后来，胡大个子也可能确实是沾了他革命军人成份好，受过伤立过功的光。在最后处理时，他厂里参与开会的另外有勤务员为这次杀人被判了刑。而胡大个子在学习班结束后回到厂里，作了个普通职工，直到退休。

【文摘】

成都军区发枪武装造反派

关于发枪，“文革”中的支左部队和军区，几乎都对所支持的组织发过枪。成都军区第一政委张国华 1967 年 8 月 20 日说：“武装左派，是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在四川有几个地方已经武装了经得起考验的革命左派，一个是万县，一个是涪陵，还有泸州。”（见《四川省农业生产计划、财贸、金属材料供应会上的讲话》）成都军区 8 月 31 日通知：“为了坚决支持红旗派，稳定泸州局势，用民兵武器装备红旗派 2—3 个连。武器弹药如当地不够，由宜宾军分区设法调济。”

摘自徐龙治主编《百年泸州》（中国文史出版社 2005 年 6 月出版）一书中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及“三次武装支泸”》之“九、武斗升级的由来”，第 290 页。现标题是本刊另拟的。

【文摘】

由中央发枪的北航红旗武装部队

戴维堤

按：本文作者当年是北京航空学院红旗战斗队（简称北航红旗）负责人，北航红旗是北京高校造反派红卫兵中得到“无产阶级司令部”肯定和支持的著名组织。从中央给北航红旗发枪一事可以看出，当时毛泽东确实是决心要“武装左派”的。给北航红旗发枪不发弹，虽然带有很大的象征性，也没有导致直接的武斗死亡，但却给其他地方起到了示范和启发作用。其影响是不可低估的。本篇摘自作者发在网上的长篇回忆录《逝者如斯》（2005年元月17日修改版），现标题是本刊另拟的。

中央武装北航红旗

1967年8月5日，我从山东老家赶回北航后，中央已经武装了北航红旗。

“七二〇”事件后，陈再道的枪杆子可能把毛泽东、林彪、周恩来等人吓了一跳。毛泽东指示：要武装左派！周恩来奉命执行。其实，早在7月18日，毛泽东在武汉就当着周恩来、谢富治、王力、陈再道、钟汉华等人的面说过：“为什么不能把工人学生武装起来，我看要把他们武装起来。”周恩来、谢富治、王力等人贪污了这个“最高指示”，没有向任何方面传达。而陈再道等人早已经领会了毛泽东的最高指示，“百万雄师”的武器大部分来自武汉军区。

鉴于“北航红旗”在中国文革中的特殊地位，中央决定，首先武装“北航红旗”。经周恩来总理亲自批准，北京卫戍区奉命把数千支枪发给了北航。（注：谢天谢地，幸亏中央文革的秀才们无权给北航发枪。）

1967年7月27日，北京卫戍区在北京航空学院主楼前举行了隆重的授枪仪式，北京军区第一政委、公安部长、副总理谢富治，代理总参谋长杨成武、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傅崇碧等军界领导人出席了授枪仪式。卫戍区副司令员李钟奇奉党中央、周恩来总理指示，代表北京卫戍区把二千五百多支苏式冲锋枪、新式半自动步枪和20支“五四”式手枪授予了“北航革委会”。随后，北京卫戍区有关人员如数把武器运到了北航。

这事立即轰动了北京市和全国。据我所知，文革中由中央直接发枪的，全国仅北航一家。外地群众组织的枪，有些是部队偷着给的，有些是抢的。

关于子弹问题，历史的事实是，当时谢富治、杨成武等人说，“你们还没有经过正式训练，发了有危险，过几天派解放军来军训时再发。”

关于给北航发枪一事，据韩爱晶说，他很早就向总理请示过，目的主要是想民兵训练打靶用。当时红卫兵们崇尚毛泽东诗词的一句时髦话——“不爱红装爱武装”。另外韩本人文革前是北航射击队的队员，爱好射击，有了枪可以组织民兵打靶——既刺激又好玩，这也是北航所有头头和群众的想法。除此之外，决没有任何其它背景，甚至同派性和武斗也联系不上，更不可能像北航某些人后来说的“是为了反党乱军、威胁首都和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安全”。至于周总理在武汉“七二〇”事件后为什么亲自批准给北航发枪——其中的奥妙笔者不得而知。但有一点很清楚，如此大事当然是毛泽东、林彪和中央、中央军委同意批准的。

现在看来，给群众组织发枪，绝对是神经病，但当时我们却受宠若惊。

革委会常委决定，由我和革委会委员刘建华负责武器保管和组建“北航红旗武装部队”问题。于是，我们把保卫部进行了改组和扩大，从全院学生中挑选了三千多人组成了北航基干民兵队伍，对内称“红武连”，对外称“北航红旗武装部队”。我们制定和公布了有关制度和组织纪律，规定：北航红旗武装部队的宗旨和口号是“誓死保卫毛主席”、“誓死保卫党中央”。（注：当时有人提出加上“誓死保卫林副主席”和“誓死保卫中央文革”，我和韩爱晶等人认为有“誓死保卫党中央”就行了。）北航红旗武装部队只执行党中央、北京卫戍区和北航革委会军事委员会的命令。北航任何个人（包括韩爱晶本人）无权调动武装部队到学校以外执行任务。我们还建立了武器库，派可靠的红旗战士昼夜值班看守。我对管武器的学生下了死命令，没有我的批准，任何人（包括常委）不准动用一枪一弹，否则“军法从事”。万没想到，我这个近乎玩笑的命令，由于我和有关人员严格执行，后来管了大用，可说救了我 and 北航红旗一命。

天安门广场武装游行

北航红旗武装部队的最大一次行动就是参加了天安门广场的武装游行。

武汉“七二〇”事件之后，北京市整天示威游行，声讨武汉军区和“百万雄师”的“反革命暴乱”。作为中央文革的铁拳头，北航红旗自然不甘示弱，加上北航红旗直接有人在“七二〇”事件中挨了打，红旗战士们气不打一处来。

革委会常委们决定北航红旗持枪武装游行，由我负责领队，要求绝对不能出事。我建议是否向北京卫戍区打个招呼，韩爱晶等人说，打了招呼反而麻烦，决定不打招呼。

我严格地挑选了持枪人员，检查了每一枝枪，不准有一发子弹。韩爱晶说，带枪为了吓唬人，若出了事，要你的脑袋。

那天，我带领荷枪无弹的数千名北航红旗武装部队战士，后面跟着浩浩荡荡的游行队伍，很快到达了新街口北口。

新街口是北京内外城分界线，进了新街口，就是进了内城了。北京卫戍区的值勤战士和公安干警如临大敌，组成了人墙，阻止游行队伍进城。

大队人马被挡住，我很着急，请值勤战士马上放行。战士们不敢作主，要打电话请示上级。一会儿，战士让我去岗哨接电话。

因工作原因，我常同卫戍区打交道，我的名字卫戍区许多有关人员都知道。电话里的人我不熟悉，可能是值班首长，他问我是谁？

我说：“我是北航红旗武装部队司令戴维堤。”

对方哈哈大笑，说：“你们武装游行，谁批准的？”

“毛主席批准的。”我随便回答。

“我们没接到通知，不能放行。你知道，这是首都，任何人不准带枪进城。”

“你们当兵的为什么能带枪？我们也是毛主席的红卫兵。你快请示傅崇碧司令员和黄作珍政委，耽误了大事你负责。”我口气很硬，有恃无恐。

“你等一下。”我等了一会儿。

“你们枪里有子弹吗？”口气有缓。

“绝对没有，我向你保证，我一支支亲自检查的，一粒子弹也没有。枪是你们发的，一粒子弹也没给，等于烧火棍，你们怕什么？”

“你们一定要注意安全，绝对不能出事，否则谁也担当不起。你不能说是我们同意的，你们自己冲吧，我命令值勤战士撤开。”

乖乖！很好！够朋友，给面子。我放下电话，赶到队伍前面，大喊：“同志们，冲呀！”这时执勤的战士们全让开了。

队伍长驱南下，赶到西单，又遇上了麻烦。只见一排排警察组成多道人墙，足有上千人，不准队伍前进。

没有功夫扯皮了。我用高音喇叭大喊：“警察同志们闪开，保卫毛主席的请参加我们的队伍，北航红旗武装部队誓死保卫毛主席，谁胆敢阻拦谁就是反革命！同志们，正步——走！”我下了命令。

数千名持枪的红旗战士高喊着口号，正步向天安门方向挺进，后面跟着几十万大军的游行队伍，警察们被冲了个落花流水，有的人帽子都掉了。游行大军很快到达了天安门广场。

游行的队伍在天安门广场呼喊了一顿口号，许多人的嗓子都喊哑了。那天天气又闷又热，但游行队伍秩序井然，斗志高昂，没有人掉队，没有人开小差。

游行结束返回学校后，我让学生们清点了武器，擦得铮亮，入了枪库，没出任何问题。

天安门广场的武装游行，锻炼了北航红旗武装部队的学生们。他们服从命令听指挥，不怕苦，不怕累，若打起仗来，一定不怕死。我和韩爱晶等头头们都非常满意。

天安门广场武装游行之后，北航红旗又捞取了不少政治资本。

【文摘】

清华大学 414 的“特种部队”

沈如槐

从“414”（本刊注：指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 414 总部，是从井冈山兵团中分裂出来的一派）成立到 1967 年底，清华两派发生过许多次冲突，如 8 月 30 日在主楼、10 月 20 日在新水利馆等地发生过较大规模的冲突，除了 67 年 4 月 15 日冲广播台是“414”主动挑起冲突外，其余大多数冲突都是“团派”（本刊注：指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一派）借机寻衅、抓捕、殴打“414”的头头所引起的。

“团派”有个“兵团保卫组”，聚集了一帮打手。哪里有纠纷，这帮打手就出现在哪里，不容分说，立刻出手，武力解决问题。“414”很多人都尝过兵团保卫组的“铁拳头”的滋味，特别是我们几个头头，每个人身上都留下了不少伤疤。我自己曾多次遭到“兵团保卫组”的殴打。……

“兵团保卫组”被“团派”称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而到 67 年底时，

他们越来越多地使用这个工具来对付“414”的学生、教师和干部。我们对“兵团保卫组”恨之入骨，却又无可奈何。虽然“414”也有一个保卫组，但并不能有效地保护“414”群众。在吕应中和陈楚三先后被“团派”绑架以后，许多铁杆的老四（本刊注：即“414”派）纷纷指责我们头头太软弱、太窝囊，明明知道“团派”抓走了人，却束手无策；他们提出要“以牙还牙，以血还血”。我们头头们也觉得不能总是这样被动挨打，必须采取有效措施来对抗兵团保卫组。经过反复酝酿，我们组建了一支特种部队，为了遮人耳目，我们把它命名为“李文忠学习班”。

李文忠是解放军 6011 部队某部六连四排排长，当时被中央授予“支左爱民模范”的称号，他有几句名言：“毛主席热爱我热爱，毛主席支持我支持，毛主席指示我照办，毛主席挥手我前进。”用一个解放军英雄模范的名字来命名一个组织，尤其是一个武斗组织，显然是对英雄的亵渎，但却是文革中的一种时尚。

我们这支特种部队实际上是一支快速反应部队，由宿长忠直接指挥。它的任务是在发生紧急情况时能迅速出现在事发现场，并有足够的力量阻止“兵团保卫组”的绑架、打人等行动，保护“414”干部和群众的安全。

“李文忠学习班”由 30 到 40 人组成，每个人都是经过严格挑选的。我们挑选成员的标准主要有三条：铁杆老四，体格健壮，根红苗正。之所以要求根红苗正，是考虑到万一某个成员被“团派”抓获，除了政治观点不同外，没有任何其他方面的把柄可被团派利用。……

“李文忠学习班”有一个班长，两个副班长。他们的办公室设在中央主楼 414 室、415 室两个房间，每天 24 小时都有人值班。平时，“李文忠学习班”的成员并不集结在一起，而是仍在原单位活动。只有特殊需要时，才将他们召集起来。他们有一个联络暗号“陈小红”，这是从正副班长三个人的名字中各取一字组合而成的。如遇紧急情况，“414”广播台将广播“陈小红到某某处集合”，“李文忠学习班”的战士们听到广播后将会以最快的速度集合起来，学习班的成员都配备了“武器”，那是清一色的铁管。这些铁管都是用自来水管锯成的，其尺寸根据各人小臂长度而定，正好可以隐藏在衣袖里而不易被人发现。

“李文忠学习班”刚组建不久就发生了“1·4 武斗”。……

12 号楼住的是自控系的学生，而自控系是“414”势力最强大的系之一。414 有一个民间广播台叫做“红尖兵广播台”，就是 414 自控系分部主办的，它专门与团派的“前哨广播台”唱对台戏。

“红尖兵广播台”设在 12 号楼二楼的最西头 227 室、229 室两个房间。这两个房间里面是连通的，是个套间。广播线路沿着 327、329、427、429、527、529 套间的墙壁往上，直到楼顶。大喇叭就树在楼顶。从一楼到四楼的套间都住的是老四。五楼原来住的是“6 字班”的人，有团派也有 414 派。当时这些人已经毕业分配离开学校。自控系 414 分部为了保证广播线路的安全，派人住进了 527、529 套间。

……

1月3日深夜、1月4日凌晨时分，“兵团保卫组”、“捉鬼队”等一大批手持铁棍、头戴面罩（清华运动队训练用的面罩）的武斗人员悄悄地上了12号楼的五楼，突然向527、529房间发动了进攻。……

……

“团派”虽然攻进房间，但还没有来得及带着俘虏撤退，就发现自己陷入414的包围之中。414总部用广播召集起来的“李文忠学习班”已经从东面的楼梯冲上了五楼。由于楼道狭窄，兵力施展不开，双方各守一头，谁都不敢贸然进攻，只能用高压水龙头对射，414虽然把“团派”堵在楼道里，却也不能轻易得手。在僵持一段时间之后，“李文忠学习班”一位战士急中生智，从房间里拖出一张双层床，竖立起来，挡在前面，几个人推着床，逐步前进，另外几个人手持高压水龙头从两边往前射水。不一会儿就将“团派”战士逼到楼道西面的死角。在一段短暂的打斗之后，所有“团派”武斗人员全部束手就擒。414把这些浑身湿透的“团派”关押在厕所里，时值隆冬，有些人身负重伤，其惨状可想而知。

……

这次武斗，是清华文革以来最激烈的一次武斗。由于有了思想准备和组织准备，特别是有了一支特种部队，414反败为胜，不仅讨还了“团派”的血债，还大大地鼓舞了414的士气，打掉了对团派保卫组的恐惧心理。

这次武斗之后，414各级领导开始重视武斗队伍的建设，特别是各系分部领导，纷纷仿效总部，建立各系的特种部队，一概以“某某学习班”命名，如“好八连学习班”等等。这些特种部队就是百日武斗期间414的骨干力量。

节录自沈如槐著《清华大学文革纪事——一个红卫兵领袖的自述》第六章，340—345页，香港：时代艺术出版社，2004年10月第二版。

【文摘】

在“青年近卫军”的武斗经历

陈益南

按：在文革中参加过武斗的人，很少写出自己的回忆，而正式出版的文革回忆录中则更鲜见这方面的内容。湖南文革研究者陈益南的这个回忆因而十分可贵，成为研究文革武斗不可多得的亲历史料。本篇摘自陈益南著《青春无痕——一个造反派工人的十年文革》，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6年出版。现标题是本刊另拟的。本篇所写的是发生在1967年7、8月间湖南“湘江风雷”（毛泽东主义红卫兵湘江风雷挺进纵队）和“工联”（长沙市革命造反派工人联合委员会）联合与被他们视为“新保守派”的“长沙高司”（长沙市高等院校红卫兵司令部）之间的武斗（以后湘、工两大组织之间又爆发内战）。作者当时所在的“青年近卫军”（誓死保卫毛主席青年近卫军）是一个以武斗出名的组织，倾向于“湘江风雷”。

纺织厂的武斗之后，“青年近卫军”名声在长沙市愈加大振，“向钢铁战士青年近卫军学习！致敬！”的大标语和宣传画在城内到处可见，各造反组织对我们“青年近卫军”的人，都格外的热情和客气，平日在街上，若发生什么小事导致的矛盾，一听是“青年近卫军”的人，别人便会主动退让，并连连致歉。这之中，一则是尊敬，二则却是畏惧。

这，使我们的虚荣心大大地获得了满足。

物资装备也得到了重视。

一批崭新的草绿色军服，由解放军三四一部队等军事院校的造反派提供，送来总部。这批军服、军鞋、挎包、水壶，除了没有红五星帽徽和红领章外，其余都是正宗的军用品。还有一批灰色的海军军服，大概是青年近卫军下属的“闪电兵团”，自行从什么军用仓库中弄来的，结果，他们那“闪电兵团”一下子成了“海军”。几千名“青年近卫军”战士全部被打扮起来，使杂七杂八颜色服装的游击队般组织，一下子被改造为近乎正规面貌的军队。换装之后，我们组织了一次武装示威游行。清一色的军装，崭新的钢枪，整齐的队伍，充满朝气的脸庞，若不是队伍前面打着一面“青年近卫军”的红旗，长沙市的市民真的会以为一下子来了几个团的解放军支持造反派。

穿上真正的崭新的草绿军服，我高兴得要死，因为我从小梦寐以求的，就是想当一名军人。尽管天气已是暑季，热浪逼人，但我们这些人却一改往日短袖衣短筒裤的穿着。草绿军装的长衣长裤，工工整整地穿在身上，扣子一粒也不撒下，全部紧扣，甚至连那不习惯的风纪扣，也一丝不苟地扣着；头戴军帽，脚穿军鞋，除了脸和手裸露以外，全身都被密密地遮蔽着，旁边的人看着我们这穿着，头上就会冒汗，但，很奇怪，我们倒觉得凉幽幽的，还说：“今年热天不怎么热。”

总部邀请了一些解放军造反派，都是军队院校的教员，为我们上军事知识方面的课。因而，懒懒散散的习惯，很快被新鲜的军事生活方式取代。军事教员们不仅教我们怎样使用武器，爱护武器，怎样在战斗中保护自己，攻击敌人，而且，对我们的作息方式，也灌输了军队的内容。

睡觉时，将枪支放在枪架上，这本是军事教员告诉我们的枪支放置规则，可是，这点，我们做不到，因为我们没有真正的军营。况且，枪离开自己，很容易被别人拿走，那时，枪支并无严格管理，你拿什么枪，拥有几支枪全是你自己的事，总部并不管。枪遗失了，也得由你自己去想办法弄一支来。自统一在解放军政治干部学校搞到那批枪后，总部就不再发枪给下面的成员。于是，那个军事教员因地制宜，让我们睡觉时，将枪放在自己枕边，但一再嘱咐，不论什么搁枪方式，不用时，一定要将枪内子弹退出膛来，使其成为空枪，并关上保险，以免发生事故。

这说来是极简单的常识，做起来也很容易，然而，我们毕竟不是正规的军人，没有受过严格的训练，结果，为这，差点出了个大事故。

有天晚上，我们睡在总部所驻矿山设计院三楼的一间大房间里，十来个人就

在水泥地上铺上报纸，以报纸当床，军用挎包做枕头，便一字儿横躺下睡了。枪，自然横放在挎包下。

半夜时分，突然，“叭”的一声巨大的枪响，使我们一下子从梦中惊醒，大家连忙爬起来，吓得要死，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但，除了房间内枪响的余音与略有硝烟外，并未看到什么其他动静，打开房门看，其他房间的人也都在伸出头，问发生了什么事情，而四周却安安静静的。

折腾了一阵，最后大家从小刘的枪上嗅出了名堂：他的枪管有硝烟味，并是热的，而且，骇人的是，他的枪居然压了子弹，上了膛，还没关保险！还有一个金黄黄的子弹壳，就在离他睡的地方不远处呆着。

无疑，是小刘开的枪。

大家下子围住了他，怒声质问他：想搞什么名堂？！

小刘窘得要命，开初，他还问：“真的是我开的枪？！”直到他被事实震住，便半信半疑地连忙解释说，他似乎在做梦，梦中有几个什么人向他扑来，白晃晃的刺刀就会要戳到他了，他便端起了枪，好像是开了枪。

梦中扣响了枪！

枪枕在头部处，为了怕被别人偷去，我们经常习惯地在睡梦中，或半夜偶尔醒来时，先用手去摸一摸枕下横着的它，看它是否还在。

小刘的手，无疑是睡梦中习惯地伸向了枕下的冲锋枪，而且扣动了板机，而这天夜里，他又恰恰忘记了将枪内的子弹退出或关上保险。

子弹顺着我们几个与他并排而睡的人的头顶上面一点点之处，直射出房间，穿透了房门。子弹在走廊墙壁下边，留下了一个白灰孔。幸亏，小刘他睡的位置头部超出了我们这几个人头部的的位置，幸亏，他那冲锋枪的发射方式是拨在“点射”位置，否则，他那颗子弹，或连发的子弹，就将使我和小李他们的脑袋开花！

第二天，海司令（本名谭海清，长沙房建公司青年砌工，人称“海哥”，担任“青年近卫军”负责人后被呼作“海司令”）知道了这件事，他又气又笑，传下话来，让我缴掉小刘的枪，叫他离开“青年近卫军”。小刘知道了，连忙找我好说歹说，要求莫缴他的枪，也莫赶他走。我自然也不愿让小刘走，因而也只是训了他几句，也就不了了之，并未去执行海司令的命令。毕竟，我们是群众组织，没有军队那么严格的纪律和习惯。此事，海司令以后也没再提起，大概，他也忘了自己下过的命令。

进入八月，在北京的湖南两派组织代表的谈判和中央首长的接见讲话，已明显有利于“工联”、“湘江风雷”造反派方面。因为，中央领导人对于“工联”与“湘江风雷”这一派已实际左右了长沙市局面的情形，已有精确的了解。而支持强大的足以稳定该地区局势的造反派组织，似乎是当时中央的战略部署。

丧失了省会阵地的“高司”派，于是想采用毛泽东主席有过的绝招：“农村包围城市。”

他们在农村，一方面迅速武装原来文革前就已存在的“贫下中农协会”组织，

发动农民武装进入城市；一方面，在省会长沙市周围的几个城市中，拼命与造反派展开争夺战，以获取有份量的筹码，使北京谈判的局面能出现逆转。

结果，离长沙市 45 公里的湘潭市，便被他们全部控制，湘潭市“工联”观点的“红造联”等造反派，则统统被他们赶了出来，一部分逃到了长沙市。

显然，长沙市的造反派不能容忍湘潭市落在“高司”派的控制之下。要知道，湘潭市只隔长沙市 45 公里，沿宽阔的柏油公路，汽车不用一个小时就可以到达。尤其意义重大的，湘潭市是毛泽东主席最准确意义的“故乡”。“红太阳升起的地方，岂能让保守派得意猖狂？！”长沙市造反派头头们一致发誓，要帮助湘潭市逃亡的造反派，夺回湘潭市或曰“解放湘潭市”！他们深知，控制湘潭市，不仅是精神上的需要，而且，也是夺回一块有利于北京谈判的最有份量的筹码。

据传，湘潭市“高司”派方面的“革造联”，出动了坦克，封锁住通往湘潭市的一座大桥。因为在湘潭市，有几座大型兵工厂，那儿生产的坦克，还没有被送往解放军的军营，却先被开上了大街，开上了柏油公路，并将炮管指向了长沙市方向。

支持造反派的军队院校，对“高司”派使用坦克上阵，并不感到意外，他们马上组织训练班，要“青年近卫军”成立反坦克队伍，去上那儿学习爆破坦克的技术。据说，那个军事技术学习班就办在三四一部队大院内，总部一个姓罗的头头原本要派负责总部警卫的我们去那儿学习，可是新发生的一场武斗情况却更吸引了我们，因而，使我们便都没有去学那军事技术，而直接上了武斗战场。

骄阳似火的八月中，一天傍晚，总部下令，部分基层组织（番号则五花八门，如有称“闪电兵团”的，有称“钢三连”、“红九连”的，还有自称“决死纵队”的，而且各单位人数不一，多则有几百人，少者仅几十人）立即到总部集合，分乘十几辆汽车，全副武装，向湘潭市方向进军，攻打湘潭市，“解放湘潭市！”

我们是总部的警卫武装，当时被组成一支“红色尖刀排”，头儿是省建筑公司一个叫“牛哥”的青年工人。大家都渴望上“前线”，根本不管总部同意不同意，纷纷爬上汽车，随着大队伍也一道向湘潭市前进。

一路上，我才发现，向湘潭市进军的汽车，远不止我们“青年近卫军”这一个组织的人，有几十个造反组织的旗帜出现在一辆又一辆飞驰的汽车上，都是荷枪实弹，情绪高昂。此起彼伏的“要奋斗就会有牺牲，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毛泽东语录歌声，飘荡在长长的公路上，久久不息。

武装的车队，在离长沙市二十多公里的一处高山边停下来，这时，天已全部黑了。我站在自己所乘的解放牌卡车上，回头一望，只见长长的车队，像一条乌龙，汽车灯光组成了两串平行的星链，从我面前，一直向后延伸，弯弯曲曲，直伸到我看不见的地方。

汽车突然都被命令停下，而一些吉普车或摩托车，却像疯了一样，从车队旁驶过来又驶过去，大概，头头们在商量什么。

夜幕，高山，车队，灯光，荷枪实弹的队伍，摩托车急促的行进声，这一切，使我仿佛进入到那大战在即决战前夕的电影场面中。

那时，我觉得这一切，很有意思，很有韵味。

而这一切，究竟是为了什么？会有什么后果？我压根儿没有去想它。

我突然发现，有二辆摩托车上，坐的是红帽徽红领章的真正军人，顿觉惊奇，连忙指给同车的伙伴们看：“你们看，解放军也来了！”

大家纷纷朝那飞驰的摩托车望去。

“是帮助我们打仗的吧？”伙伴中有人发问。

“帮我们搞侦察。”有人答。

“省军区亮相了？”又有人问。

“你做梦！军区不会支持我们，这是军事院校的，要不，就是四十七军的野战军。”又有人自动解答。

“你怎么晓得是四十七军的？”

“总部易麻哥讲的，中央派四十七军来支持我们。”

“真的？”

“骗你有什么用？！”

“那我们就不怕军区了！我们也有解放军做后盾。”

“早就不怕它了！”

“……”

亲眼看见解放军跟我们一道上“前线”，虽然仍不确切他们究竟是哪支部队的，也不知他们执行的是什么任务，但我心里仍非常高兴，也感到愈加踏实。这一来，“解放”湘潭市就更容易了。

车队又前进了，其实，并没有人送继续前进的命令来通知我们。反正，只见前面那辆汽车开动了，后面的汽车马上启动，跟了上去。这样，一辆接一辆，而且并不一定是同一个组织的汽车，却自动都接着向前开了。

走了不到十分钟，在路旁一座大型农药厂旁又停了下来。车队上跳下一些人，涌进了那农药厂，好一会儿，又涌了出来，说这厂里空空荡荡，没有一个人，又到处弥漫着难闻的农药味。

车队再不动了。

同样没有人来告诉我们，是该休息，还是在车上待命，一停就是几个小时。

大约到午夜——那时，没几个人能有手表，因为一块上海手表的价格要人民币120元，对于月薪仅三、四十元的青工来说，还是很昂贵的东西。我们一整卡车的人，居然没有一块表，谁也不知几点几分了，只是猜想，大约夜十二点了。仍然没有人来告诉我们应该做什么。但，瞌睡来了。于是，不管三七二十一，大家先后跳下汽车，各自寻一块地方，或路旁，或树下，躺倒休息。

我没下车，抱着步枪，睡在了车厢板上，一下子就进入了梦乡。

事后想，如果那夜，“高司”派来袭击，肯定我们会遭受重大伤亡，尸横遍地，血淌长路。很幸运，“高司”派的军事指挥水平，亦同我们一个样，脑子里同样只有“武斗”的概念，而没有“战争”的观点，尽管我们口里平日嚷嚷着的是“打仗”。

第二天清晨。柏油路上又热闹起来，人们的喧哗声、汽车的喇叭声，使长长的公路仿佛成了一个集市。

还是没有人来下指示。我们“青年近卫军”的指挥官是总部一个姓罗的头儿，可是，此刻谁也找不着他，不知他钻到什么地方去了。

大家都烦躁起来。

这“仗”还打不打？起码，我们得吃早饭呀？而此刻，早饭的影子在哪里？

太阳升起到半空时，车队突然启动了，也不知谁下的命令，乱哄哄的人们只互相传话：到前面的板塘镇吃早饭。

板塘镇是湘潭市郊的一个小镇，到了那儿，离湘潭市就只咫尺之遥了。

反正看不到指挥官了，一辆又一辆的汽车，就只能以前面那辆车的动或停为命令，车队的头既已启动，大家就都跟着上。

一无具体命令，二不见指挥官来动员，加上饥肠辘辘空肚子，坐在汽车上，大家都无精打采，懒得说话，昨天傍晚出发时那股高昂士气，已无影无踪，心里只想着赶快到板塘镇，好美美地吃喝一餐。

我抱着枪，坐在车厢靠近驾驶室的地方，微闭着眼，任凭清早的晨光，不停地在我身上扫着，耳朵却在品味那不时从公路旁山林、稻田里飘来的鸟叫声。

大概行进了十多分钟。突然，公路旁响起了惊天动地的枪声，不是一两声试探，不是间断的零星，而一上来就是“叭叭叭……”密集连续震耳的枪声，像喜庆的人家放连珠似的鞭炮一样。

汽车“嘎”的一下紧急刹车，我们车上的人被这陡然的袭击吓懵了，一时不知该如何动作。还是那个跳出驾驶室的司机朝我们大喊：“还不赶快跳车，等死呀！”车上的人才活了起来，连忙纷纷跳车。甚至有人匆忙跳下去，却忘了拿搁在车上的枪，但不敢再爬上汽车，只好先乖乖地卧在路边的水坑里再说。我正准备跳车时，发现有一个竟然像鸵鸟，埋头蹲在车厢板上，大概也是吓糊涂了。我顿觉好笑，上去朝他屁股就是一脚，并大声说：“这有什么用，赶快跳下车去！”那个小伙子被我踢了一脚，似乎清醒了，抬起头连连说：“我跳车，我跳车！”边说边爬到车厢边，跳了下去。

我跳下车后，蹲到汽车后轮处，靠这汽车和轮子给我挡着可能射来的子弹，因为，我已搞清，子弹是从同一个方向射来的。

一会儿，枪声就没有了。我们的人便逐一站了起来，远远看去，只见公路一侧很远的一座山包上，有一些带枪的人在晃动。不知谁喊了声：“那是‘怒火’的，追上去打！”于是，一大批人便朝那山包涌去，“冲啊！”的喊声，骤然响起。

我随着人流，也横过公路，踏入水田，高一脚低一脚地向前冲，手里端着枪，口里也随着高呼口号。没有了子弹“叭叭”声，而只有我们几百上千人漫山遍野的呼喊声。大家的劲头陡增，恐惧一下子全扫，只顾倾尽全力追捕，以图抓住那山包上的“敌人”，全然忘记了危险，好像这是一场只有胜利而不会有伤亡流血的游戏。

突然，枪声又“叭叭叭”响了起来，那是从前右方向另一个山包上打来的，

子弹呼呼地飞过我们的头顶。有的也打中了正在冲锋追捕的人。我的周围，陡然倒下了三、四个人，有的哇哇叫着，有的一声不响，只“扑”的一声扑倒在水田里。其中有一个人，我认识他，是勘探设计院的一个汽车司机，姓罗，他的额头被打了一个洞，鲜血喷出，糊满了他的脸，他哼都没来得及哼一声，便离开了人世。他的冲锋枪还没来得及打一枪，就掉在身旁。

不知为何，这次突袭来的枪声，和这一个个倒下的伤亡者，却并未能吓住正在冲锋的人们。相反，我们不管三七二十一，仍是直朝前跑，愤怒的口号声愈加震天价响。看来，人并不是在任何时候都胆大或胆小的，到了一定的处境中，某种氛围就可以使最胆小的人也毫无一丝恐惧感的。

对方无疑被我们这气势吓住了，毕竟，他们也不是真正的军队，也不敢用机枪大规模地杀人，否则，我们方面将会有更多的牺牲。他们后退了，退守到另外一座山上。

我们冲到了与对方对峙的一个山头上，也就不再冲锋，而是各自找一个可作掩体的地方卧下来，朝对面山上开枪射击。猛烈密集的射击，直朝对方泻去，没有什么瞄准之类规范射击动作，反正朝对面山上放枪就是。此时，简直不是在“打仗”，而是像小孩子玩枪似的。尤其那些持冲锋枪的人，一扣板机，三十几发子弹就“叭叭……”一下子报销了，反正有的是子弹，从挎包里拿出弹夹，换上又打。我不知道这种射击，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程度的伤亡，但是，我们终于没能冲到对面那座山上去。

我与十来个人卧在一条浅沟里，横着组成了一条散兵线。大家并不是一个组织的，反正看袖章知道是造反派的，就互相间表示亲热。我的旁边是一个佩着“红旗军”袖章、年岁显然比我大很多的青年人，他开枪不像我这样，一扣板机，就近乎连着扣，让一夹子弹很快全打了出去，而是不慌不忙，一发一发慢慢地打。

“红旗军”是由复员军人组成的造反组织，因为，保守派方面原来有个全由复员军人搞的“八一兵团”组织，所以造反派中的复员军人便针锋相对，成立了这个“红旗军”。后来，中央下令这一类由复员军人单独组成的组织一律解散，因为这些人只要拿上枪，就完全可能是真正的军队。因此，“红旗军”后来也被命令解散了，尽管它也是造反派。

我打完了二夹子弹，正在蹲着将一夹子弹压入弹仓时，突然，一颗手榴弹落到我的前面，我还没来得及作出反应，旁边那个“红旗军”的青年人，猛然大喝：“快卧倒！”随着他的吼声，他迅速又扑了过来，将我推倒，并扑在我身上，用他的身躯盖住了我的头。一切我都来不及想，只觉得像是被打了一闷棍，晕呼呼的。

过了十几秒或几十秒，反正，没有听见爆炸声，那个压在我身上的“红旗军”，毕竟有经验，他慢慢从我身上移开，却伸手抓起了那颗手榴弹，并大声笑了起来，说：“他妈的，算我们命大！”

我怯生生地看了看他手中的那颗手榴弹，也不由笑了起来。原来，那颗手榴弹并未拉导火索，甚至连后盖也未拧开，便囫圇着扔了过来，根本就不会爆炸。

周围的人都为这突然事件吸引，纷纷跑过来看，看这没拉开盖的手榴弹，笑着，骂着。

那个“红旗军”朝前面望了望，然后站起来，端起手中带刺刀的步枪，厉声朝周围的人喝问：“他妈的，这手榴弹是谁丢的？！”

我们都惊住了，一时不解他的意思。

“‘红色怒火’的人隔那么远，前面田里又有（没）得一个人，这手榴弹不就是你们这些人中的哪个王八蛋丢的吗？！”“红旗军”青年人继续说。

我想，对呀！“高司”与“红色怒火”的人，哪怕是世界投弹冠军，也没法从那边山上掷到这边山头上来的。

“是谁？！快说，坦白从宽，不然，莫怪老子不客气，一刀捅死你！”“红旗军”圆瞪着眼，一边朝周围的人扫着，一边厉声吼道。

在众人也都带火的眼光互相逼视下，一个背冲锋枪的瘦小个子哭丧着脸，站了出来，轻声说：“是我，是我甩的，……”

“妈的，你瞎了眼，用手榴弹来炸自己人！”“红旗军”怒气冲冲骂道。

“不知怎么搞的，我想朝前面丢手榴弹，一出手，却横着飞到你那儿去了……”瘦个子此时一脸煞白。

我想，这家伙平日一定不会扔手榴弹，加上又是卧着扔，这一来，右手一使劲，手榴弹没有向前，却朝左边横飞过来了。

“你是哪个组织的？”

“是不是保皇派？！”

恰巧，这个家伙又没有佩袖章，周围的人便都朝他吼了起来。

瘦小个子连忙从口袋里掏出一个“毛泽东思想捍卫军”的袖章，哆哆嗦嗦地说：“我也是造反派，我也是造反派……”

这“捍卫军”是一个人数不多的造反小组织。

“妈的，幸亏没拉盖，不然，我们今天要死在你小子手上。你这样子，还配打什么仗，带什么枪！把枪缴出来，滚回家去！”“红旗军”又厉声朝那家伙喝道。

“好，我缴枪，缴枪……”瘦小子连忙把枪放在地上，并取下胸前的子弹袋，也放在地上。然后，他颤颤兢兢地问：“我可以走了吗？”

“你走吧！”“红旗军”口气平和了一些。

瘦小个子踉踉跄跄地走了。

我对那个“红旗军”说：“谢谢你保护了我。”

“谢什么，一个死手榴弹。”他淡淡一笑说，“我们俩都命大。”

他高高兴兴地捡起瘦小个子缴出的枪，不再同我说话，而只顾专心拨弄那枪去了。

我感激地望着他，心想，这世上，好人真不少。

一个人能下意识地在危险之刻，不顾自己而去保护一个陌生人，这个人难道不是一个有崇高品质的人吗？

这位“红旗军”老兄，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看到过他，当时也没问他姓甚

名谁。只是从年龄上推算，他现在已是六十多岁的人了，不知他在何方？我衷心祝愿这位在内心深处有着黄金般高贵品质的老兄，能是人生的幸运者，此时正愉快称心地安享晚年！

双方对射了一阵，对方又退了。

我们这一方的人便又蜂涌而上，又是一阵阵漫山遍野的“冲啊！”喊叫声。

我端着枪，冲到一个山坡腰上时，看见一个穿背心的青年扑躺在地上，大声唤叫喊痛，两个佩着“红中会”红卫兵袖章的女中学生蹲在他旁边，正轻声地安慰他。我停下一看，只见那个青年人背右侧被打了个板栗那么大的洞，鲜血从那个洞口直往外涌，一块还连在背上的皮肤，随着涌出的血流，缓缓地上下漂荡着。

我问：“怎么搞的？”

一个女学生答：“刚才冲锋时打伤的！”

“冲锋？”我有些纳闷，这个人怎么会背上受伤呢？冲锋应该伤前胸呀！难道是后面人开枪打的？

我回头一看，果然，我们在冲锋，可后面山上仍有些人蹲在那儿开枪，恐怕还有机枪，因为，头顶上“呜呜呜”地不停地响着子弹啸叫声。

我连忙朝后面山上挥动两手，同时，扯开喉咙大声喊道：“后面不要开枪！后面不开枪！打了自己人呀！……”

旁边几个正在冲锋的小伙子，看到这情形，也同我一起，举枪挥手，向后面大声喊着。

喊了一阵。大概没有人开枪了，因为枪声明显减弱了，山上的人，也陆陆续续冲了下来。

我想，那场武斗中，凡是后面中弹伤亡的人，八成是让自己人打的。有些家伙只喜欢开枪，而不愿跑步冲锋，又没有人指挥，结果，冤里冤枉使一些人丧生，或落下残疾。

我又回到那个伤号旁，两个女学生正用她们带的毛巾在包扎他的伤口。但，血仍流不止。

我脱下军衣，再脱下里面的白纱背心，然后，用这背心加上从伤号身上脱下的背心，扎在一起，作绑带，捆压住那堵着伤口的毛巾。

我问女学生：“你们知道救护车在哪吗？”

一个女学生说：“在公路上就有。”

我看了看伤号，又看了看这两个女学生，伤号佩着“湘江风雷”袖章，女学生又是“红卫兵中学革命委员会”（“红中会”）的，心想：都是造反派，没办法，这事只该我干了，不然，这个人会死在这儿。

我穿好军衣，将自己的步枪与军用挎包交一个女学生拿着，嘱咐她俩跟着我。然后，我在她俩的帮助下，将那伤号背起，然后，朝山下公路奔去。

从山下到公路还有很长一段距离，又都是田埂路，累得我气直喘。尤其，受伤者那伤口的血也流到我的军裤上，湿漉漉的，很不好受。

总算捱到了公路旁，但救护车还在公路前面那段路上。实在背不动了，我看

到公路对面卧着一些佩着“湘江风雷”袖章的人，便朝他们喊道：“喂，我是‘青年近卫军’的，这个伤号是你们‘湘江风雷’的人，你们快来几个人，背他去到救护车那儿吧。”

“喂，小心！‘红色怒火’会从山上开枪，他们想封锁公路。”那边有人对我这样说。

我不管那么多，首要的是要他们接受自己组织的伤员，因而仍喊：“这个人很危险，快来人背过去吧！”

“你把他背过来啰！”那边有人大声说。

“我们掩护你，你背他过来吧！”他们居然都这样说。

我很气愤：这班王八蛋，看我累成这样，不快来帮忙，还推三拉四。

我真恨不得将伤员一摔，扭头就走，摔给他们看，你们一个组织的人还不管，我管什么！

但一看那面色蜡黄的伤员，还有那两个急得要死的女中学生，我又不能那样做，况且，我在我们厂里也是“湘江风雷”的人啊！

我一咬牙，对那两个女学生说：“你们在这等我，不要过去。”

一个女学生问：“为什么？”

我说：“你没听他们讲吗？‘红色怒火’会从山上朝公路开枪。”

我反手将伤员搂紧，一咬牙，就背着他跳上了公路，朝斜对面那些人奔去。果然，有“红色怒火”或“高司”的武装人员在封锁公路，我背到公路中间时，枪声响了。子弹“叭叭”地打了过来，在我前面的柏油马路面上“崩崩”直响。我很紧张，然而也顾不得想什么了，只是加快了奔走的步子。

斜对面那些人开枪了，不知他们朝哪儿打，因我也不知“高司”派的人从哪儿打来的枪，但是他们显然是在掩护我。

算我命大，把伤号背到“湘江风雷”那些人之中，我没有任何伤着的地方，除了那伤号的血，染湿了我的军裤一大片地方。

把伤员往他们一交，我又弯着腰猛跑过公路。因为我的枪还在那两个女学生手中。

这一回，子弹只在头上“呼呼”作响，没打在路面上。后来想，穿过被封锁的公路时，纯粹是运气好，不然，哪怕我弯着腰，也会是人家一个大大的活靶子。也许，对方那些开枪的人，也是我们这种“玩”枪的水平吧。

那个伤员也命大，当初看那涌血的架势，我很为他担心，觉得凶多吉少。不料，第二年，有天在朋友的聚会上，我又遇到了他，他是一个什么工具厂的青年工人。在无意闲聊中，他知道我就是把他从山上背下来的人，很对我说了一些感谢的话，同时，还捞起背上的衣服，让我看那个已结疤长了圆圆一快硬肉的伤口。我很惊异人的自身恢复能力，那涌出的热血，使背上的那快皮在伤口洞处上下翻腾的情形，我一辈子也忘不了，而不到一年功夫，这个伤口就结结实实弥合了，这个原来的伤号也仍是一副雄赳赳的结实样子。按相术的观点，“大难不死，必有后福”，从那以后，我再不曾见过他，此时，不知他是否已享上了大福，在弥

补当年他身上那如泉涌般喷出的热血？

我从女学生手中拿回自己的枪和装了子弹的军用挎包，陡然便觉得自己很累很累了，随便找个地方一坐，便不想动弹。

其时，已过中午，没吃早饭，也没看见中饭，又这样闹腾了一上午，岂有不累之理？

这“仗”我不打了，该回去歇息歇息。我想。

我与这两个女学生便往回走，她们的肚子也饿得够呛，当然同意我的提议。

我们一同来的几个弟兄，都冲散了，不知谁向何方。到了公路上，才遇到一些“青年近卫军”的弟兄，正在拦住一辆往长沙市方向的卡车，不由分说爬了上去。我也不管三七二十一，跟着爬了上去。

这卡车是“工联”属下一个工厂造反组织的，刚刚送了一卡车武装人员到这“前线”，正准备返回长沙市，我们正好搭这车回去。

车上一下子上来三、四十个人，什么组织的都有，都是昨晚出来的，都没有吃早饭、中饭，精疲力尽。幸好，那时并没什么“战场纪律”，谁愿去打，只管往前冲就是；不想干了，要退下“火线”，自己撂开腿走也就是，没有人用枪逼着你不准退，也没有人指责你；只是，你若受了伤，你若没吃饭，你若没有子弹了，同样也几乎没有人来及时抢救你，或及时送给你。

回长沙市的途中，看到了几辆专门送饭和面包之类食品的汽车停在路边，车上的人正向围着车厢的人分发小钵饭和面包，谁要吃就挤上去领就是。可是，这食品车离“前线”起码四、五华里路远，而且，它是做“等人上门”的“买卖”（当然还是免费供应），并没有想要去“上门服务”，没有像电影中常有的那种炊事班挑饭上前线阵地送吃的情景。我也不知这些送饭与面包的汽车是属于哪个组织的，看情形，大概是“工联”方面的，因为，食品车上面的人统一都身着机械工人常穿的那种蓝色工作服，他们分发食品也不管对象是谁，只要是来领者，一律发给。

我们都想停车去领点饭或面包来吃，以对付一下正在“闹革命”的肚子，可是，运送我们的汽车司机不高兴，他说他的“工联”组织要他快赶回厂去，不能耽搁，不能停车等我们。没办法，就再坚持一会吧，回长沙市再说。

下午回到长沙市后，我连忙跑到我们厂里，在食堂弄了点冷饭冷菜，饱餐一顿之后，便在澡堂干干净净将自己身子和军装洗净，换上了便装。因为，军装只有一套，洗了，就没有替换的，只好在着装上从“兵”再退回到老百姓。

我这一身殷红血迹，使厂里的同事都大为吃惊。我便绘声绘色地将这次武斗中的事，讲给他们听，同事们听了，有佩服的，有赞赏的，也有怀疑的，这从他们的问话与眼光中都可以看出。

二年多后所谓“一打三反”运动中，我这身被血染的军服，使我遭到了不小的麻烦。专案组的专家们，根本不想听我营救伤员的往事，而只希望从中“挖”出我是个杀人凶手的证据。幸好，那个伤号没有死，相信是他为我作了硬梆梆的活证明，最终，使专案组妄图罩我一顶杀人凶手帽子的指控落了空。

【文摘】

杀个人比杀只鸡还容易

杨里克

我杀过鸡。

杀鸡时，左手抓牢鸡翅膀和鸡头，右手扯去鸡脖子上的细毛，找准鸡的颈动脉，稳准狠地一刀下去。待鸡血喷涌时，将鸡头朝下，滴干净血，最后用鸡翅膀交叉卡住鸡头。问题是鸡要垂死挣扎，拼命“折腾”；有时下手不准不狠，事情就有点麻烦。

我也杀过人。

42年前，在文化大革命遍及全国的武斗狂潮中，我们几个中学生红卫兵造反派枪杀了一个对立派的“俘虏”。食指轻轻一扣，哒哒哒，对方就完蛋。多么简单，干净利落。

事后，我感慨道：这年头，杀个人比杀只鸡还容易！

42年了，很多事已经淡忘、淡化。

杀人的事是忘不了的。

为此我已经受到过法律的严厉惩罚。

面对一个鲜活生命的逝去，我向亡灵表示深深的忏悔。

现在可以说了。

我已经见惯太多的血、太多的泪。

1966年，我在四川省西昌地区西昌高中读高三。我们刚刚通过毕业考试，就遇上“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怀着“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的朴素的“阶级感情”，文革一开始，我参加的群众组织是“保皇派”红卫兵。

很快，“保皇派”就被“造反派”彻底击溃，土崩瓦解。在“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的革命口号蛊惑下，我立即参加了“造反派”。西昌地区成了“造反派”的一统天下。

1967年，西昌地区的“造反派”分裂成两大阵营，互相攻击、内斗不休、“上纲上线”、日趋激烈。

对立派背后有西昌军分区支持，我们这派背后有铁道兵部队支持，双方相持不下、互不相让。从开始的大字报、大辩论、肢体冲突、石头、棍棒、钢钎、藤帽，最后发展到真刀真枪的大规模武装冲突。

真刀真枪从哪里来？到解放军那里去抢！抢枪那么容易？有的是“明抢暗送”。

毛说“要文斗，不要武斗”。但毛后来又说：“全国无战争经验已十多年，打打也可以，锻炼了群众。”“小青年，爱玩枪。”随即武斗狂潮席卷全国，天下大

乱。

西昌地区 1967、1969 年爆发大规模武斗，事后统计，死伤 2000 多人。

就记忆所及，我知道的因武斗而死的人员，列举如下：

1. 张忠华之死

张忠华是我的同年级校友，西昌人，烈士遗孤。他性格内向，沉默寡言。好像没有参加哪一派群众组织。就算运动初期参加派性组织，也不是活跃分子，后来也是一个“逍遥派”。67 年他到我们学校去，据说是去讨要烈士家属抚恤金。结果被盘踞校内的武斗人员（全是高、初中学生）抓住，不由分说、拳脚交加、活活打死。

死后无人追究，不了了之。

2. 秦沛生之死

69 年我们到西昌地区德昌县一个铁道兵部队去抢枪。在武斗激烈的混乱形势下，部队将枪支弹药埋入地下。

我们有 100 多人，漫山遍野，盲目搜寻。后来在部队“内部人”暗中指点下，终于找到一些埋藏地点，抢到部分枪支弹药。枪是战士的生命，部队组织众多士兵包围我们，企图将被抢的枪夺回去。我们在狂奔的汽车上，一边向士兵头顶上方开枪射击，一边加大油门，强行突围。慌忙之中，汽车开错方向，来到安宁河边，前面无路，汽车熄火。而解放军大队人马跟踪而至。情急之下，我们弃车而逃。徒步涉水，冒险渡河。

我们几个高中同学手牵手向河里走去，有的背着枪，有的扛着子弹箱。

当我们走到河中心，突然遇到一股湍流，将我们 4、5 个人一下冲散了。我当时肩扛一箱子子弹，一下就沉入水底。我只好扔掉子弹箱，游向对岸。

秦沛生同学沉入水中后，再也没露面。他永远离开我们了，尸首都没看见。

3. 小崔同学之死

1967 年，在一次抢枪行动中，小崔同学被军火库守卫用棍棒击中头部，当即身亡。他是初中生，只有 15 岁。

4. 武建胜之死

武建胜，初中生，凉山军分区司令员之子。1967 年某天晚上，坐在汽车上强行冲关时，被我方乱枪击中，当即死亡。

车上其他幸存者，别来无恙？

5. 王同学之死

王××，女，我校本派同学，瘦小孱弱。被女友玩枪走火，面对面击中。临死前只说了一句话：“你怎么这么不小心啊！”其父为本派“铁杆”粉丝，他在亡女追悼会上说：“可惜她没有死在文攻武卫、保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火线上……”一时传为美谈。

6. 王英之死

王英，男，本派初中生，派头头。被对方制造的四川林学院大楼爆炸，压在底楼。

7. 卢志淼之死

卢志淼，西昌冕宁人，本校同学，对立派头头。被他的初中生“警卫员”面对面擦枪走火击中，当场死亡。

8. “小长生”之死

“小长生”，西昌人，英俊少年、活泼可爱、面红齿白、人见人爱。他是我方某派头头的警卫员。在一次坐车经过我方关卡时，被我方守卫误击，中弹身亡。

9. 武氏兄弟之死

武××，西昌建筑社工人，我方武斗队员。他浓眉大眼、气概不凡、敢做敢为、胆大包天。一看就是武松式的英雄人物。1967年某天晚上，护送我方罗姓头头返西昌卫校时，被我方警卫误会，慌乱之中，开枪击中头部，掀去半边头盖骨。英雄气短，令人扼腕叹息。

武××死时年方20来岁。他有一个弟弟，年仅10岁。某日，武妈妈牵着他和我方众多群众到西昌军分区门口和平请愿。被隐藏在军分区内的对立派发射的迫击炮弹击中，可怜的小弟弟当场被炸死，武妈妈也被炸断右手。

1969年武斗结束后，我在西昌街上看见武妈妈靠卖凉开水为生，一分钱一杯。连失两个爱子，而且死得如此悲惨，痛何如哉！她那凄苦的面容，沉默寡言，永远铭记在我心中！武妈妈晚景凄凉，不知所终。

10. 张国强之死

张国强，我校对立派武斗头目。威武雄壮，声名远扬。1967年武斗初期，在一次游行示威时，被我方卫校头目罗××用小口径步枪击中头部身亡。

11. 江浙同学之死

1966年，从江浙一带转学过来一个同学就读我们西昌高中。因为同校时间太短，我已记不清他的姓名和相貌。1967年武斗中被对方抓住，当场枪毙。

大约从这时期起，双方仇恨升级，开始互相“枪毙俘虏”。谁先动手，已经分不清了。也没有多大意义。在“好人打坏人，活该”、“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国共两党斗争的继续”等极左思潮的影响下，双方都将对方当国民党对待，当然是打死对方越多越好。

12. “红背心”之死

1969年，在西昌会理县一次战斗中，我方将对方击溃。对方武斗人员藏匿于当地群众当中，我们一时无法分辨。但对方有一人身着红背心，在逃亡中十分显眼。最终被我方从人群中抓出来，当场枪毙。会理县我方群众大惊骇，不敢再指认其他对立派人员。

13. 女卫生员之死

1969年，西昌益门一场战斗中，我方击毙对方十余人，并活捉一名女卫生员。我方武斗队员（一些工人）欢呼雀跃，围上去动手动脚。光天化日之下，公然调戏妇女，成何体统？我方武斗头目（在校大学生）见状大怒，“给我拖出去毙了！”

结果，不是把流氓毙了，而是将女卫生员毙了！

“砍了树子，免得老鸹叫”。

15. 尹排长之死

尹排长是西昌军分区“支左”解放军，在派性冲突中被杀，原因不明。我只亲眼见过法医检验他的尸骨。

16. 林明春之死

林明春，西昌人，我校高 65 级校友。他父亲是西昌“伪国大代表”。65 年他考上四川林学院，是我们对立派的武斗队员。在西昌冕宁县武斗中，他掩护战友撤退时被俘。他们几个俘虏，被我们这派的、他的四川林学院的同学代××枪杀于安宁河畔。代××后来被判处无期徒刑，劳改十多年后获释，生活艰难。这次枪毙俘虏事件中，我的一个高中同学也参加了。去年同学会上，我几次请他说说当时的具体情况（因为我没有在现场），他没有同意。他只是说，在别人先开枪后，他才随后开的枪。他和林都是西昌人，有顾虑。

17. 卢永扬之死

卢永扬，成都人，四川林学院学生，我们这派的。他精明强干、仪表非凡。1967 年他率领十多个大学生操纵几门迫击炮驻守一座小楼。后来被对立派大学生暗夜中引爆炸药，睡梦中全部死亡。具体情况至今不详。

18. “反动”学生之死

四川林学院文革前有两个“反动学生”，留校监督劳动。文革中他们参加了武斗，1967 年最先阵亡。今年，我问与他俩同校的程××，具体情况怎样。程避而不答。

19. 冷华秀之死

冷是我的校友的妹妹，初中生。她参加了武斗。1969 年因受本派武斗人员“性侵”，羞愤自杀。

20. “米面馍馍”之死

1967 年，在进攻对立派西昌城中心据点“大礼堂”时，我是第一批冲锋队员。一颗手榴弹炸翻了我，我被救下火线。这时，西昌城一个卖“米面馍馍”的小贩继续冲锋，被对方的机枪打死。

21. 唐力生之死

唐是我们西昌高中 67 级学生，我们这派的武斗头目。1967 年一次武斗中，被对方击中头部，当场死亡。

22. 高邻居之死

高是我的邻居，中学生，我们不在一个学校。在一次武斗中，头部中弹而亡。

23. 郝伟民之死

郝是我们西昌高中 68 级的学生，一直没有参加武斗。在我们反攻西昌胜利的最后一次战斗中，他临时参加进来，却被自己人“走火”打死。

24. 成都知青之死

一个成都知青半路参加我们对西昌城的反攻，他作战非常勇敢。在一次黑夜的战斗中，他冲在前面，不幸被自己人击中头部身亡。

25. 女医生之死

我方一个女医生，在晚上给危急病人动手术时，被对方的冷枪打死在手术台上。

26. 国民党老兵之死

这个国民党老兵是对立派的武斗队员。在进攻西昌卫校的战斗中中弹。临死之前，他用全身力量将手中的轻机枪压入水稻田中，不愿被我方缴获。他的“敬业”，引起双方一致感叹。

27. 进攻者之死

1967年，我方调集重兵，进攻对方武斗据点“物探大队”。结果消息走漏。晚上，我方在渡河时遭到对方伏击，我方死伤惨重。当时我在成都参加“学习班”，具体伤亡人数不详。

28. 会理工人之死

1969年，我们进攻会理。我们武斗人员乘坐汽车奔赴前线。半路上对方向我们开火。车上一个会理的年轻工人中弹，肠子流出来了。抢救不及时身亡。

.....

还有很多血泪故事，回想起来就令人恐惧、伤悲、惆怅、愤懑。

以上例子，都是我亲身经历、亲眼所见，或者亲耳所闻的。也许个别细节有出入，大致情节是不会错的。因为在当时，在西昌地区范围内，很多事情，都是当即传开，大家都知道的。

我曾经在80年代书面联系过著名女作家张××，著名学者季××，请他们根据我的口述，写写文革中的武斗。后来没有下文。

文革确实是“史无前例”的，千载难逢的、匪夷所思的、波诡云谲的。它集中反映了中国社会各方面的矛盾，体现了中国社会的本质。

那年头，我见过太多的血、太多的泪。

泪干了、血消了，人民总是淡忘。“时间永是流逝，街市永是太平”。

我没有文学才能，写出我亲身经历的文革，写出我的爱恨情仇。

希望文革亲历者，都能写出自己的文革经历。

“我经过昨天，我知道明天。”

1969年，双方势同水火，都想打垮对方。

当然是武力打垮。

讲理、辩论都失去意义。

当时，每个单位几乎都分成两派。哪派势力大就把对方排挤出去。

西昌城中，双方阵势犬牙交错。互相攻战，狼烟四起。

城中心的大礼堂为对方武装盘踞。地处要冲，对我方威胁很大。我方“总部”决定武力拔除。

战斗在上午打响。

我们几个中学生在火力掩护下，翻越围墙，进入对方阵地。对方从楼上扔下

一颗手榴弹，在我身边爆炸。我只觉得有东西进入我的小腿，但并不感到疼痛。顿时鲜血淋漓，我被送往医院。幸好，最大的一颗弹片（有葡萄干大），打穿烟盒、打断指甲刀、打穿军用皮带，进入肚皮表层。是指甲刀救了我一命。

医生手忙脚乱，没有打麻药（可能麻醉师已经逃离）就给我扩创，剜去烂肉，取出 5、6 个弹片。至今身上还有两个——当时没有发现。后来在 2004 年，我出过一次车祸，医生照片时发现的。

在此之前，我还受过一次轻伤。一颗菜籽大小的手榴弹弹片，打入我的右眼角膜。医生在角膜上划了一刀，用吸铁石吸出来的。当时右眼角膜上有一道白雾，后来自然消散。

年轻人，血气方刚，受伤恢复快。只不过，我的视力变为 1.0。

1969 年，在西昌军分区支持下，对方用武力将我方全部打出城外。

我们四处流窜，抢枪、杀人放火。当时西昌地区有 10 个县，我们打遍 8 个县。

武斗结束后，四川省革委给我方武斗队的调查结论是：“走一路、杀一路、烧一路、抢一路。”此结论当然含有派性，对方比我们也好不到那里去。

1969 年，我方武装力量发展壮大。兵分两路，杀向西昌城。我们的口号是“血洗西昌”。

进军路上，我们偶遇对方 4 个武斗人员。当场打死 3 个，活捉一个。

俘虏叫卢刚强，中学生，武斗小头目。当场审讯，我做记录。卢腿部负伤，坐在我们面前。他非常镇静，令人敬佩。

卢见四周荷枪实弹、杀气腾腾，便缓缓地主动说他家里还有一支 AK 式冲锋枪，他可以叫人带来缴给我们。言外之意，让我们饶他一命。谁知我们头头嘴角一歪，他身边的警卫员立即扣动 AK 冲锋枪扳机。“叭”，一颗子弹正中卢的脑门心。弹孔正圆，像海豚的呼吸孔。正面没有血迹，脑后没有创口。卢一声不吭，身体一歪，慢慢向左侧倒下去，一动不动了。没有挣扎、没有扑腾，就这样命丧黄泉。

一个年轻的鲜活生命，转眼之间就在我们面前倒下。

大家默默无语。没有议论，没有叹息。

这才是最大的残忍。

现实就是这样残酷无情。武斗中，如同战争一样，谁也不知能活到哪一天。

我想，德国纳粹残杀犹太人，苏联红军枪杀波兰军官，日本人南京大屠杀，“无产阶级专政”杀害张志新、林昭，其具体执行人，可能也跟我们这时一样，没有什么感觉。

形势比人强，随大流而已。

我杀过人，我知道人权。

谁还杀过人？

网上聊聊。

后来才知道，卢刚强的同伙中，有一个是我的小学同班同学马志明。他是负伤后举手投降，再被我方当场打死的。我当天拉肚子，浑身无力，没有冲在前头。否则他可能不至于死。

我在文革中，有三次被对方抓住，其中有两次是被对立派同学看在同学情分上释放的。当然，那时双方对立情绪还没有发展到互相枪毙俘虏的地步。否则，我这种“武斗”积极分子，如果被对方俘虏，必死无疑。

第二天晚上，我们武斗队占据了西昌 410 钢铁厂。

410 厂是战略要地。对方曾动用大部队，企图武装夺回，被我们击退。激烈的战斗逐渐平静下来。

有天晚上，我突然感到口渴，就到工厂食堂找水喝。看见 4 个武斗队员在悄悄商议什么。我一看就知道他们准备枪杀俘虏。

工厂食堂里关押着一个成都“知青”，对立派的武斗队员。他是被当地农民捉住后交给我们的。据说他对当地农民很凶悍。

我历来对打、杀俘虏不感兴趣，没有参加对他的审讯。只记得他 20 出头，中等身材，身体非常强壮。但送来时就被暴打一顿，已经奄奄一息。

我方武斗队员欺骗他说，我们准备释放他。他强打精神，勉力而行。

在漆黑的夜里，我们一行人向工厂旁的“海河”边走去。周围都是齐腰深的荒草。

他逐渐发觉情况不妙，便开始哀求我们饶他一命，说他家里还有一个孤苦无靠的老母亲，非常可怜。说着说着就停下不走了。

我们威胁他，不走就当场打死他。

事已至此，插翅难逃。他绝望地抬头“仰望星空”，发出一声长叹：“难道今天是我活在世上的最后一天吗？”说完后就再也不说话，默默随着我们来到河边。

他一个人站在“海河”岸边，身后是 4 名武斗队员。我站在一群人后边几米远，我当时是抱着看热闹的心态。

没有人发布命令，没有人说一句话。

突然，“砰、砰、砰”，几声手枪声划破夜空，成都“知青”身中数弹，应声落入水中。

沉入水中的“知青”，身体慢慢浮出水面，没见任何动静，顺流向下游漂去。

我一时冲动、头脑发热，突然扣动轻型冲锋枪扳机。当时我的想法是，别人都开了枪，我不开枪，不是显得我太胆怯了吗？何况我历来以勇敢、不怕死闻名。

“哒、哒、哒”！我手中的轻型冲锋枪向着河中远去的“知青”开火。把前面 4 个人吓一大跳。

杀完人后，我们 5 个人默默回去，都不说话。

中途，只有我说了一句：

“这年头，杀个人比杀只鸡还容易！”

原载“黄海岸边一棵树的博客”，<http://blog.sina.com.cn/jiangsushengqu>。原题为《这年头，杀个人比杀只鸡还容易》。

【故纸堆】

张国华谈中央批准给造反派发枪

按：当年四川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组长、成都军区政委张国华的这个讲话，明确讲到成都军区给几个地方的造反派发枪是经中央批准的。这对研究四川文革武斗问题是一个重要的参考资料。本刊收到文革资料收藏者兼文革史学者李晓航、王锐分别提供的不同版本的这个讲话资料，从中摘录出这一部分内容供研究者参考。

再一个讲武装左派问题。武装左派是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在四川有几个地方已经武装了经得起考验的革命左派，一个是万县，一个是涪陵，还有泸州。万县、涪陵革命派经过几个月同保守组织的斗争是经起了考验的。所以在前几天把他们武装起来了。革命派的武装要成为协助人民解放军保护国家财产，维护社会秩序，防止坏人杀害革命群众的强大力量。武装革命派要有计划、有步骤的实施，要经中央批准后再作，一定要掌握在最可靠的人手里。我们这两个地方都报了中央，经中央批准才作的，不能随便武装。需要武装的革命派必须有这么几条原则：(1)武装的必须是左派；(2)革命派手头的枪，只准自卫，不准进攻，不许拿枪去镇压群众，那是不容许的，只能是自卫的，决不允许进攻，不准去镇压群众；(3)武装要按单位（一个工厂、一个学校）来屏决，不能跨行跨业，跨行跨业不行，那种武装搞法有危险；(4)武装起来的单位，即革命派必须绝对听从调动，听从当地驻军最高的指挥员调动。在成都来说，要绝对听从警备司令部的调动，服从指挥；(5)必须是造反派占优势的地方，解放军要派人去加强政治教育和军事训练。必须是这样，要有这么些条件。这些条件如果不具备，就不能武装。总括起来说，就必须是紧跟党中央，紧跟毛主席，紧跟中央文革，不能搞山头主义，不能搞割据各霸一方，必须有统一的领导，统一的行动，统一的思想，即毛泽东思想，必须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

摘自《张国华同志在四川省农业生产计划、财贸、金属材料生产供应会议上的讲话》，1967年8月28日。原载东方红出版社（即四川人民出版社）革命造反总部主办《蓉城快报》第1期，1967年9月。王锐提供。现标题是本刊另拟的。

【编读往来】

黄肇炎来信谈“三种人”提法出现的时间

上期王学泰的文章很精彩，只是其中有一小瑕疵：“北京从严处理‘打砸抢’分子（那时定文革中的‘三种人’就有‘打砸抢分子’）在一监引起震动。”这句话表述不够准确。清理“三种人”是1982~1984年前后的整党运动（不叫“运动”的运动）中的事，而文中所说的“那时”指的是1976年底~1977年的“揭批查”运动，似还不存在“定‘三种人’”问题。那时对所谓“打砸抢分子”一般是定的“帮派体系骨干”、“现行反革命”这一类罪名，大多给予刑事上的定罪判刑，而后来整党中定“三种人”则是清除出党断其仕途。